

心中自有其理想範式。

以上種種有關臺人與日人間文化霸權的抗爭歷程，或是臺人間在建構臺灣文學論述時的角力情形，多少亦與本研究主題有所關連，但限於篇幅與精力，將俟來文再探究竟。

第五屆「中國近代文化的解構與重建」
【鄭成功、劉銘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03年4月25~26日

日治時代臺灣古典詩中的劉銘傳

——以櫟社徵詩（1912）作品為討論範圍

廖振富

台中技術學院副教授

壹、前言

劉銘傳（1836~1896）與台灣關係至為密切，從1884年中法戰爭受命督辦台灣軍務，擊退法軍，到1885年台灣正式建省後擔任首任巡撫，任內大興洋務，建樹頗多，是帶領台灣邁向近代化的先驅人物，最後卻因故請辭離台，事在1891年。清光緒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清廷擬再度起用劉銘傳辦理海防，被他婉辭，次年五月，日本打敗中國，清廷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次年元月劉銘傳病逝故鄉，得年僅五十九歲。

日治時期的台灣古典詩，有相當多以劉銘傳為描寫對象的作品，反映出當時知識分子對劉氏的看法。其中筆者發現有兩次分別以〈追懷劉壯肅〉、〈劉銘傳〉為題的公開徵詩活動，此二題目前留下百餘首長短不一的作品。前者在1912年由當時最負盛名的詩社「櫟社」主辦，是該社為慶祝成立十週年而舉行大型詩會，會前公開徵詩的兩個詩題之一（另一詩題為〈笨港進香詞〉）。後者則是1922年由台灣留日學生創辦的文化啓蒙刊物《台灣》雜誌主辦，是該誌辦理第一期公開徵詩的題目，共刊出作品七

律廿三首。¹

在這兩次活動中，櫟社徵詩作品不論是作品的質量或內涵與形式的多樣性，都遠優於《台灣》雜誌的徵詩作品²，因此，本文將探討範圍集中在櫟社徵詩的九十首作品。

除前言、結語之外，正文部分包括以下各節：

其一，相關作品簡述及寫作背景的分析。首先說明本題之命題由來、徵詩經過，接著列表簡述作品的基本資料，包括各種體裁的數量、作者、作者居住地等，並略加解說。本節之末，進而探討寫作背景，試圖解釋這些作品對劉銘傳全是正面頌揚的原因。

其二，「敘述語氣」及「書寫立場」的差異。首先就敘述語氣，歸納為三種趨向：以贊頌為主、以感慨為主、及兼融兩者合一，各舉詩例加以解說。隨後，探討「敘述語氣」與詩人寫作的心理動機有何密切關聯？接著挖掘寫作者三種不同的書寫立場：一種是以漢族立場，藉緬懷劉銘傳，感慨台灣淪日，對日本領台採強烈抗拒的態度；另一種是在讚揚劉銘傳之餘，也高度肯定日本治台的貢獻，對日本領台抱持接納的態度；另外，也有游移於兩者之間的第三種選擇。

其三，劉銘傳的文學形象及其寫作手法。首先，歸納相關作品所呈現的劉銘傳形象為五點，分別是戰功彪炳、政績卓越、文采風流、壯志未酬、聲名不朽。接著分析詩人描寫劉銘傳的兩種常用手法：一種是「簡單化」，主要以描寫「清賦」之詩例，觀察詩人描寫的單一觀點之缺陷；另一種是「誇大化」，舉證分析詩人如何以誇大的想像筆法，彰顯劉銘傳在詩人心目中的「完美典型」。

其四，異質詩作的對照閱讀——另一種觀點看劉銘傳。在上述櫟社徵詩作品之外，筆者另舉出丘逢甲、吳德功、洪棄生、賴和四家之詩例，觀察上述諸人透過詩作反映對劉銘傳的「另類觀點」，加以對照閱讀，從而

¹ 《台灣》雜誌，以「劉銘傳」為題舉行公開徵詩，徵詩啟事見於第三年第一號，詞宗為林獻堂。入選作品，共有前二十名各一首，「限外」三首，總計二十三首，發表於第三年第三號，頁43-46。入選者包括賴和（以筆名「懶雲」發表，兩首，分得第二、十三名）、王敏川（錫舟，二首，第八、十四名）、謝星樓（醒如，三首）、陳逢源（一首）。另南社社長趙雲名一首、櫟社詩人陳槐庭（心水）也各有一首，分得第六、七名。

² 就數量來說，前者有90首，後者有23首；就形式而言，前者古近各體都有，篇幅長短與表現手法差異性甚大；後者都是「七律、限東韻」。從內涵來看，前者十分多元，後者則較為單一。

思考藉詩歌創作以評價歷史人物的複雜面向。

貳、相關作品簡述及寫作背景分析

一、作品來源

本文擬探討以〈追懷劉壯肅〉為題的九十首作品，是台中櫟社為慶祝該社成立十週年，在大會集會之前向全台詩友公開徵詩而來，這些作品當時是否曾在報刊發表，不得而知³，所幸作品原稿被完整保存於《櫟社十週年大會詩稿》的原件中，這一冊詩稿原本在林獻堂宅中被發現，經林家後人於近年捐出，目前為台大圖書館特藏室所珍藏。⁴這批珍貴資料目前除筆者外，仍未見任何相關的研究。

（一）1911年梁啟超在台中命題

〈追懷劉壯肅〉一題，雖是櫟社1912年公開徵詩的詩題，但此題的原出題人，卻是1911年應林獻堂之邀來台詩問的梁啟超。這段曲折在《櫟社沿革志略》並無清楚交代，該書在「明治辛亥四十四年」（1911）條目下只有如下記載：

粵東名士梁任公（啟超）、湯覺頓（叡）兩先生及梁女士令嫻等遊台，我社開會歡迎之。四月二日會於瑞軒，社友二十人、來賓十二人。……詩題為「追懷劉壯肅、洗硯、新荷、鈔詩」等。⁵

這次詩會所作的詩題，其中「洗硯、新荷、鈔詩」三題都是擊鉢吟詩會的詩題，相關作品已收錄在《櫟社辛亥春會詩錄》中，目前同樣收藏於

³ 櫟社相關活動及作品，多發表於在台中發行的《台灣新聞》，該社成員傅錫祺、陳瑚、林載釗、莊雲從等人曾任該報的記者，這冊詩稿，其中有一份署名「弘農生」的作品，詩末有：「右懇老先生代為斧削訂正，未列付梓，曷勝感耶！臺灣新聞社 詞苑系老先生殿」字樣，據此份資料推測：這次徵詩啟事及作品可能曾發布於《台灣新聞》，可惜該報紙目前已佚失未見，無可查考。不過《櫟社十週年大會詩稿》原冊，共收入〈笨港進香詞〉一二八首、〈追懷劉壯肅〉九十首，總量甚多，如果曾在報上刊出，以常情判斷，可能是從中挑選部分作品發表而已。

⁴ 關於台大圖書館收藏櫟社詩稿的源由及詩稿內容，詳見拙文〈台大圖書館藏櫟社詩稿初探——外緣問題的考察〉，發表於「漢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主辦，2002年11月30日，會議論文集將由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

⁵ 見傅錫祺《櫟社四十年沿革志略》頁4，興南新聞社印刷原版，昭和十八（1943）年。

台大圖書館特藏室。⁶但該冊詩稿並未收入〈追懷劉壯肅〉一題的作品，原因是：這是梁啟超在1911年四月二日當天晚上與中部詩人參加櫟社歡迎晚宴，席上梁氏應眾人所請而出的題目。由於是不限體、不限韻，並非擊鉢吟會所作，當天晚上交卷者不多，故當時所作可能未被完整收集。⁷詳細經過，在新出版的《水竹居主人日記》第三冊中有完整記載，該書1911年四月二日（中曆三月初四日）相關內容如下：

晴天，前記諸友並在瑞軒茗談，十二時飯罷，遂並穿禮衣往台中驛候迎清國舊臣梁任公啟超氏也。此舉候迎者本島紳士詩人計三十餘名，及下車並隨到丸山旅館投名刺行禮，然後仍歸瑞軒。近五時，諸社友並諸紳士及梁任公隨員湯覺頓等三十餘人，俱在物產陳列館前寫真。寫罷，又並入瑞軒，臨櫟社晚宴……燕飲之間，社友癡仙君起而述：「此日之會，得諸貴賓光顧，實敝社之光榮。」少頃，梁任公亦起而答詞曰：「台灣之風土民情，我本欲來領略，恨無知己之人，今與獻堂君相契，故得與諸君晤面；又逢貴櫟社開會，殊屬幸遇。但今夜酒席中俱文雅之人，只好談風月，國家政治不必提及。」道罷，俱拍掌稱快。少頃，又談及推敲，甚為有趣，僉曰：「請先生命題。」公曰：「追懷劉壯肅公，不拘體、不限韻」（壯肅公乃舊政府欽差劉銘傳，二十年前在東大墩築城建考棚，立聖廟，號台灣府台灣縣，開科取士一番。）燕飲至十時罷。才敏捷先提七律多人，予亦呈一律⁸……。

⁶ 這冊詩稿的介紹詳見註4所揭一文，詩稿內容的初步分析，則可參見拙文〈台大圖書館藏櫟社詩稿的主題內涵探析〉，發表於「台中縣開發史學術研究會」，台中縣文化局主辦，2003年3月30日。

⁷ 黃得時〈梁任公遊台考〉一文，第九節「櫟社詩會、追懷劉壯肅」，根據《櫟社沿革志略》的記載，認為〈追懷劉壯肅〉一題都是當日梁任公歡迎會上所寫，並說：「當日參加歡迎會之本地詩人之中，以〈追懷劉壯肅〉為題目作詩的有林癡仙、林獻堂、莊太岳、施家本、丁寶濂等人。其詩如下……。」黃氏所述的本地詩人關於此題之作品，應是引自《櫟社第一集》、《無悶草堂詩存》、《太岳詩草》等書。由於他並未見到《櫟社十週年大會詩稿》，故不知此題曾由櫟社在第二年辦理公開徵詩，且作品數量達九十首。至於黃得時所引的五首作品，可能有的是1911年歡迎會上所寫，有的則是次年公開徵詩時所寫。如丁寶濂，當時並未加入櫟社，根據《櫟社沿革志略》、《水竹居主人日記》二書所記載的梁氏歡迎會出席名單，與《霧峰林家留真集》所刊的歡迎會紀念合照，都未見丁寶濂出席此會的線索，丁氏之作極可能是1912年徵詩時所寫；而林癡仙一首，《無悶草堂詩存》編年於1912年，與〈笨港進香詞〉並列，可見也非1911年歡迎會上所寫。黃得時此文見《台灣文獻》3卷16期，1965年9月。

⁸ 見張麗俊原著、許雪姬等編纂解說：《水竹居主人日記》第三冊，頁35-37，中央研究院

梁啟超訪台，是由林獻堂居間安排一手促成，這是日治初期台灣文化界的一大盛事。⁹為了避免總督府的猜忌，梁氏到達台中時，是由櫟社作東，以詩會的名義召開歡迎會。梁氏在歡迎晚宴上特別強調：「今夜酒席中俱文雅之人，只好談風月，國家政治不必提及。」正是為此而發。當時台灣詩社最常見的活動方式是限題、限體、限韻並限時交卷的「擊鉢吟」詩會。而當天晚宴因為顧及日本官方的監視，梁氏乃應眾人之請，而以〈追懷劉壯肅公〉為題，由眾人共同賦詩，由於不限體、不限韻，也未限時交卷之形式，可知並不屬於「擊鉢吟」。宴席結束後，究竟有多少人交卷不得而知。《水竹居主人日記》只說：「才敏捷者先提七律多人，予亦提一律」。

值得探討的是：梁啟超以〈追懷劉壯肅〉為題的動機為何？表面的原因是：劉銘傳擔任台灣建省後的首任巡撫時，曾在台中建省城，而此會正是在台中舉行。但更深層的原因，可能是梁氏藉弔古以傷今，隱含對台灣歷史與時代變局的強烈關照。以梁氏對晚清政局介入之深，他對清廷因甲午戰爭失利而割讓台灣之傷痛，感受必然深刻。藉由追念劉銘傳，其實他思考的是：中國的積弱，與台灣為日本所奪取的關聯這一頁慘痛歷史，這可從他自己所寫的〈遊台灣追懷劉壯肅〉七古長詩，及〈台灣雜詩〉第四首清楚看出來。¹⁰

（二）1912年櫟社以此題公開徵詩

1912年6月，櫟社為慶祝該社成立十週年，擬邀全台詩人參加紀念大會，大會於當年六月十五日至十八日舉行¹¹，在大會舉行之前，櫟社曾事先以〈笨港進香詞〉和〈追懷劉壯肅〉兩個詩題向各界公開徵詩，徵詩所得共包括〈笨港進香詞〉有七絕共一二八首，〈追懷劉壯肅〉則含蓋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七絕各體，共九十首。這些作品的原稿被蒐集裝訂成

近代史研究所發行。

⁹ 關於梁啟超訪台的經過及影響，詳參（一）黃得時〈梁任公遊台考〉，《台灣文獻》3卷16期，1965年9月。（二）葉榮鐘〈梁任公與台灣〉，《台灣文獻》創刊號，1964年4月。（三）葉榮鐘《台灣民族運動史》第一章第一節〈梁任公與台灣民族運動〉，自立報系出版部。

¹⁰ 梁啟超遊台詩作，曾以「海棠吟」為名刊於《台灣詩薈》第14、16、18號。其中〈遊台灣追懷劉壯肅〉見第16號，〈台灣雜詩〉見第18號。

¹¹ 關於櫟社十週年大會的舉行經過，詳參拙文〈台大圖書館藏櫟社詩稿初探——外緣問題的考察〉，第三節「從台大圖書館藏櫟社詩稿探討櫟社早期活動及其與全台詩人之往來」第三目「對外大型詩會」之二「櫟社十週年大會」，發表於「漢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所主辦，2002年11月30日。

冊，即是《櫟社十週年大會詩稿》。¹²櫟社在梁啟超訪台後的次年，再度以〈追懷劉壯肅〉為題公開徵詩，當時正是滿清覆亡，民國成立之年，此題之時代意義格外引人注目。

二、作品分體簡述

以下將本冊詩稿的體裁、作者、數量，先以表格整理，再略加說明。

（一）五言古體

作者	居住地	作品數	作品句數、字數	備註
施家本	鹿港	一首	56句 280字	櫟社社員
林國賓	桃園	一首	28句 140字	
傅仲輝	北斗	一首	24句 120字	螺溪吟社社員
陳 瑚	苑裡	三首	第一首 26句 130字 第二首 28句 140字 第三首 36句 180字	櫟社社員 《枕山詩抄》只收其中第三首

五古共有作者四人，作品六首，其中陳瑚一人佔了三首，而施家本、陳瑚兩人是櫟社社員，但施家本寫這首詩時尚未入社。¹³傅仲輝是當代著名詩人林亨泰先生的外祖父，同題他另有五言排律一首。施家本一首已被收入《櫟社第一集》中，但陳瑚的《枕山詩抄》所收本題只有一首，可見這份詩稿的參考價值頗高。

（二）七言古體

作者	居住地	作品句數、字數	備註
林震東	新竹	114句 796字	竹社成員，多次出席櫟社活動。

¹² 櫟社在大會舉行之前，以此二題公開徵詩，在《櫟社沿革志略》一書中並無記載，很可能是由該社事先在報上發布消息。由於這冊詩稿的出土，才能得知徵詩的事實。詳參前註所引拙文的考證。

¹³ 根據《櫟社沿革志略》記載，施家本加入櫟社是在大正八年（1919）年。

魏清德	台北	46句 318字	第一、二句為五言，以下為七言，瀛社重要社員，曾任副社長。
陳紹年	田中	32句 224字	據《櫟社沿革志略》1912年條目，可知是田中人，曾出席櫟社十週年大會。
黃溥造	田中	64句 448字	同前
魏國楨	田中	36句 252字	同前
徐杰夫	嘉義	24句 168字	羅山吟社
謝石秋	台南	28句 196字	南社
林湘沅	台北	36句 252字	南社、瀛社
林石崖	台北	52句 332字	瀛社社員，前十六句為五言、後三十六句為七言
葉篤軒	台中東勢	30句 210字	櫟社社員（1919年因「久缺席」被除社籍）
林癡仙	台中霧峰	16句 112字	櫟社發起人
陳 貫	苗栗苑裡	28句 198字	櫟社社員，陳瑚之弟

七古一體，總數共十二首，出自十二位作者之手，其中第一長詩是新竹詩人林震東（榮初）所寫，魏清德、林石崖兩人作品，雜有五言句，但仍以七言為主。另外，魏清德、林湘沅、林石崖是台北「瀛社」社員，謝石秋是台南「南社」社員，葉篤軒、林癡仙、陳貫三人都是櫟社社員。林癡仙一首曾收入《無悶草堂詩存》卷四，而陳貫《豁軒詩草》所收〈追懷劉壯肅公〉卻是七律，與本冊詩稿所收之七古一首完全不同。¹⁴由於七古篇幅多屬長篇，故雖只有十二首，總字數卻居各類之冠。

（三）五言律詩（含五言排律）

¹⁴ 陳貫《豁軒詩集》頁70，所收〈追懷劉壯肅公〉一首內容如下：「片壤經營志可哀，撫摩故壘獨低徊。十年孤島傳新政，一代中原數異才。滄海成田應痛哭，忠魂化鶴合重來。大墩墩畔城樓在，憑弔斜陽又幾回。」見龍文出版社「台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二輯第十二冊。從內容七、八句來看，本首有可能是作者在台中（大墩）1911年梁氏歡迎晚宴席上所寫。

體裁	作者	居住地	作品數	字句數	備註
五律	陳子卿	霧峰	一首	8句40字	曾參加林獻堂的「萊園詩會」
五排	林慶賢	北斗	一首	16句80字	
五律	霽綠	不詳	四首	每首各8句40字	
五律	梅圃主人	北斗	一首	8句40字	螺溪吟社
五排	傅仲宣	北斗	一首	16句80字	同前
五排	傅仲輝	北斗	一首	16句80字	同前
五排	林獻堂	霧峰	一首	24句120字	櫟社

以上五言律詩作者七人，作品十首，其中屬於五言排律者四首。除「霽綠」不詳何人之外，陳子卿、林獻堂兩人住霧峰，而林慶賢、梅圃主人、傅仲宣、傅仲輝四位都是北斗人，可能同是螺溪吟社成員。另，林獻堂作品已收入《櫟社第一集》中。

(四) 七言律詩

作者	居住地	備註	作者	居住地	備註
胡南溟	台南	南社	趙雲石	台南	南社・兩首
林幼侯	新竹	・竹社・兩首	黃雪樵	南投	
黃潛淵			北郭園後人	新竹	
林鍾英	新竹	竹社	蔡子昭	鹿港	櫟社
鄭濟卿			陳子敏	同前	
王瑤京	新竹	竹社	何如僧		
林錦村			許元圭		
曾寬裕	竹北		林伯廉	北斗	
鄭幼佩	新竹		陳纖雲	鹿港	
蔡祖芬	台南	南社	李玉斯	清水	鰲西吟社
弘農生	大肚		鄭作型	嘉義	羅山吟社

黃孜業			張升三	豐原	櫟社
鄭毓臣	新竹		傅錫祺	潭子	櫟社
佚名			林仲衡	霧峰	櫟社
元煌	草屯	兩首	陳槐庭	鹿港	櫟社
丁式周	鹿港	櫟社	蔡惠如	清水	櫟社
陳筱竹	台南	南社	呂蘊白	神岡	櫟社
張玉書	草屯	・櫟社・兩首	莊雲從	大甲	・櫟社・三首
黃服五	斗六				

以上七律，合計作者卅七人，作品四十三首，作者含蓋各地詩人，而以新竹竹社、台南南社及台中櫟社成員居多。其中丁式周一首收入《櫟社第一集》，至於傅錫祺《鶴亭詩集》書中的〈追懷劉壯肅〉卻是七絕，內容與本冊詩稿所收錄傅氏所作的七律完全不同。¹⁵另外，林仲衡一首、莊雲從三首，均未見於個人詩集《仲衡詩集》、《南村詩稿》中。

(五) 七言絕句

作者	居住地	作品數	備註
永鳥蘇南	台中	四首	日本人
黃守謙	桃園	四首	桃社，後加入瀛社
林湘沅	台北	四首	瀛社
林文華	大里	二首	櫟社，後因不出基本金喪失社員資格
陳基六	清水	五首	櫟社

以上七絕作者五人，作品十九首。比較特別的是永鳥蘇南，是本題作者中唯一的日本人。由於七絕篇幅甚短，因此作者多半連寫數首，藉組詩

¹⁵ 《鶴亭詩集》頁45所收之〈追懷劉壯肅〉七絕一首，編年於1911年，在「櫟社辛亥春會擊鉢吟」三題〈洗硯〉、〈新荷〉、〈鈔詩〉之前，可推測七絕這首是歡迎梁啟超詩會所寫，其內容如下：「二十年前草昧開，大墩鼎足立三臺。可憐轉瞬盧龍賣，城郭難尋舊址來。」詩末自注：「大墩築城未十年即割讓於日本，現已城郭盡毀矣。」七律一首則應是1912年之新作。

形式以呈顯主題。至於篇幅更短的五言絕句，並不適合承載這種人物歷史、家國時代的龐大議題，因此並無任何作者採用。

總上以上各類作品，包括五古六首、七古十二首、五律十首、七律四十三首、七絕十九首，合計九十首。作者人數共為六十三人（扣除傅仲輝、林湘沅兩人各重複計算一次），其中櫟社成員十八人，瀛社成員可考者有魏清德、林湘沅、林石崖、黃守謙等四人，南社成員可確定有謝石秋、胡南溟、趙雲石、蔡祖芬、陳筱竹等五人，竹社可確定：林震東、林幼春、林鍾英、王瑤京等四人（但其他新竹詩人仍多）。其他桃園、嘉義、田中、北斗等地也都有不少詩人參加此題之寫作。

三、相關作品寫作背景的分析

劉銘傳在台灣的時間，始自 1884 年閏五月中法戰爭期間奉命督辦台遇軍務，到 1891 年五月請辭台灣巡撫一職而正式離台，前後約六、七年。劉氏離台四年之後，1895 年五月台灣即因中日甲午戰爭而被割讓給日本。

本題相關作品，是 1912 年五、六月間所寫，當時日本領台北有十七年之久，台灣總督是佐久間左馬太，雖然仍屬「初期武官統治階段」，但先前由於後藤新平擔任民政長官的大力主政，已為日本統治奠定了穩固的基礎。¹⁶

從題目來看〈追懷劉壯肅〉一題，「追懷」二字意即追念緬懷，「壯肅」是劉銘傳死後，清光緒皇帝所追贈的「諡號」。題目本身已明白顯示：作品內容是以正面肯定劉銘傳為前提。從古典詩的屬性來看，本題性質較接近「詠史詩」。由於劉銘傳是已亡故的前清大臣，而當時不但清朝已滅亡，且台灣成為日本殖民地，統治者已易主，但劉氏與台灣的種種，畢竟是距離不過二十多年前的事蹟，對寫作者而言，多半留下鮮明的印象，因此，詠史詩的描述歷史人物事蹟並加以贊揚歌頌，及藉弔古以傷今的時代性，乃成為此類作品的主要書寫傾向。

根據當代史學界的研究成果顯示：劉銘傳治台確實有不小的貢獻，但

¹⁶ 後藤新平擔任民政長官，主要是在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任內（任期 1898-1906），1906 第五任總督佐久間左馬太接任，後藤繼續留任半年後辭職離開台灣。關於後藤新平在台灣的治績，詳參黃昭堂《台灣總督府》第二章第二節「兒玉總督和後藤新平」，黃英哲中譯本，頁 81-97，自由時代出版社；及楊碧川著《後藤新平傳》第二章〈台灣民政長官〉，克寧出版社。

也並非無懈可擊的毫無缺失¹⁷，何以本題相關作品都是一片頌揚之聲而毫無異辭呢？筆者認為可能與下列原因有關。其一是：晚清衰敗與日本領台的鉅大衝擊。其二是：日本人對劉銘傳治台成績的肯定。其三是：傳統文人的理想投射與私人感情因素。以下試分述之。

（一）晚清衰敗與日本領台的鉅大衝擊

由於晚清積弱，導致內憂外患交相逼迫而至，其中列強割據，對中國領土主權的侵併，尤為當時有識之士的切膚之痛。1894 年中日甲午戰爭的爆發，直接造成次年台灣淪為日本殖民地的悲慘命運，更使台灣人面臨曠古未有的鉅大衝擊。在此之前，劉銘傳在台灣雖只有短短的數年建設，卻使台灣出現一片欣欣向榮的發展前景，超越中國內地各省。台灣正式建省，確立了在中國版圖中的重要地位，劉氏推行新政的諸般措施，雖迭有爭議，但在紛亂動盪的晚清政局中格外顯得光芒耀眼、彌足珍貴，不免使台灣人興起對台灣加速開發的樂觀期待。然而，劉氏去職不到數年，台灣的統治權已由清廷拱手讓予日本，台灣人的熱切期待，瞬間化為幻影，因而對劉銘傳治台的政績倍加懷念，也就不足為奇了。

（二）日本人對劉銘傳治台成績的肯定

日本領台之後，有不少建設是在劉銘傳的基礎上持續推展，從總督府官方到日本學者，都曾對劉銘傳治理台灣的成績大加肯定。如關於劉銘傳的清賦工作，1905 年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中村局長，曾對劉銘傳的清賦事業有如下評語：「其功績決不可沒，故如說在土地制度上開一新紀元並為過。」¹⁸而著名日本學者伊能嘉矩不但在《台灣文化志》一書中贊譽劉氏清賦事業：「實為清朝治台措施中空前之大成果」¹⁹，更為劉銘傳撰寫傳記，於 1905 年在台北出版；其單篇專文更直接以〈台灣舊時之一偉人劉銘傳〉為題，大加推崇。²⁰

¹⁷ 參黃秀政、黃文德合著〈首任台灣巡撫劉銘傳去職研究〉一文，其中「劉氏在臺推動新政的得失」一節，歸納近人關於劉氏治臺成效的研究成果，除肯定其正面貢獻，也指出不少缺少，文刊《台灣文獻》49 卷 4 期，1998 年 12 月。

¹⁸ 原文見《台灣土地調查事業概要》頁 33-34，中譯轉引自江丙坤《台灣田賦改革事業之研究》頁 25，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台灣研究叢刊」第 108 種。

¹⁹ 見伊能嘉矩《台灣文化志》中卷，中譯本頁 317，台灣省文獻會出版。

²⁰ 伊能嘉矩曾撰寫劉銘傳的傳記，書名是《台灣巡撫トシテノ劉銘傳》，於明治 38 年（1905）6 月由台北新高堂書店出版。並有專文〈劉銘傳の半面〉、〈台灣舊時の一偉人劉銘傳〉發表。參見江田明彥編〈伊能嘉矩著作目錄〉，《伊能嘉矩與台灣研究特展專刊》頁 124。

日本官方與學者對劉銘傳的肯定，在〈追懷劉壯肅〉一題的幾首作品中曾直接提及，如林湘沅說：「論定新朝分外榮，有人爲比鄭延平」，葉篤軒說：「得閒偶讀伊能史，令我追懷彼美感嘆欲歔歔」，蔡惠如的作品則說：「鳳麟卻被天驕識，佳傳修成播海東」²¹以上引詩的「新朝」、「天驕」即是指日本統治者而言，「伊能史」、「佳傳」則都可能是指伊能嘉矩爲劉銘傳所寫的傳記。雖然林、葉、蔡三人對日本領台的反應不一（詳見下文），但都提到日本人對劉銘傳的推崇，可見當時的時代環境一致肯定劉氏對台灣的貢獻。

（三）傳統文人的理想投射與私人感情因素

劉銘傳出身民間，以平定內亂的戰功崛起，並無科舉功名，其後更在中法戰爭時督辦軍務，進而擔任台灣首任巡撫，推展新政，甚至兼理學政，並且能詩擅文，有《大潛山房詩鈔》、《劉壯肅公奏議》等著作。對科舉之路已斷的台灣傳統文人而言，劉銘傳的文武兼備，不但是他們理想中的崇高典範，更使他們因現實困境及時代集體挫敗感而萌生的「英雄崇拜」心理，找到投射宣洩的出口。如林湘沅此題七古一首說：「讀書萬卷何所成，文章兩字誤蒼生。何如拋卻毛錐子，馬上亦足取功名……吁嗟乎丈夫立志當如是，安能鬱鬱久事雕蟲技。倘使當年苦窮經，未必拾芥取青紫。……此身已受文章病，我亦從茲悔讀書」謝石秋之詩，也反映類似的心理：「男兒不幸讀書始，讀破遺書誇種子。爭如馬上立功言，反戈還復攻書城。……吁嗟男兒讀書行志耳，壯夫豈老雕龍技，莫爲文名賤武功，如此讀書書不死。」

另外，有些作者曾與劉銘傳有過接觸，對劉氏的推崇懷有私人感情因素在內，如斗六黃服六有句云：「公門我亦小桃李」句下自註：「余於己丑（按：1889）倖售，適公典學試時也」，北斗林慶賢五言排律一首有句：「我愧公門李」，其下亦自註：「公己丑督學，僕受其知遇」陳瑚五古三首的第一首則說：「巡撫臺疆日，榮戟臨栗里。我時方幼稚，識公自此始。」（作者陳瑚生於1875年，劉銘傳在台時，陳瑚約十五歲以下）最特別的是櫟社詩人林仲衡（1877~1940）是林朝棟之子，而林朝棟則是劉銘傳在台

時極爲器重的部屬。林仲衡七律一首的前半說：「元戎小駐霧峰東，緩帶輕裘見古風。總角卅年曾識我，掀髯一笑尚懷公」可見劉銘傳曾到過霧峰林家，林仲衡童年時與他有過直接接觸。以劉銘傳對林朝棟及霧峰林家的照顧，不難想見林仲衡對他的懷念應有不少私人感情因素。²²

以上三個原因是當時台灣傳統文人，撰寫〈追懷劉壯肅〉的時代背景與心理因素。但當時出身鹿港的著名詩人洪棄生，卻是一個迥然不同的特例。洪棄生與霧峰林家詩人林癡仙、林幼春叔侄情誼甚篤，1910年曾應林家之邀，作〈次韻梁任甫與林家詩〉七古長詩一篇並附信函一封，寄給在日本的梁氏。²³1911年4月2日，洪棄生也出席了櫟社舉辦的梁啟超歡迎會，並合影留念。同時，他也參加了4月3日以〈新荷〉爲題的擊鉢吟會。²⁴但筆者推測，他在梁啟超歡迎宴上不但沒有撰寫〈追懷劉壯肅〉，1912年櫟社以同題徵詩，他也不曾參加。以洪棄生對寫詩的熱衷和自信，他的「不寫」，其有更複雜的因素。簡言之，洪氏對劉銘傳在台灣推行新政，大抵並不表贊同，曾有〈鐵車路〉、〈機器局〉、〈西洋燈〉等加以批評，洪氏對劉銘傳因辦理清賦事業而引起「施九緞事件」尤其不滿，曾以〈蒿目行〉長詩大加批判。洪氏反對劉銘傳的新政，有些是基於傳統文人思想守舊的習性，但有些則是基於關心庶民大眾，反映新政推展中的種種缺失，和對民眾的剝削傷害。筆者將於第五節中加以探討。²⁵

參、「敘述語氣」與「書寫立場」的差異

²² 林朝棟在中法戰爭中，受劉之命駐守獅球嶺抗拒法軍有功，1888年因清賦而爆發的施九緞事件，亦由林朝棟率軍救平。而「開山撫番」的工作，劉銘傳對林朝棟更多所倚重，任命林擔任中路統領，林因而藉開採樟腦累積不少財富。劉銘傳對霧峰林家的照顧，包括建請在台中為林朝棟之父林文察建專祠，以及為林朝棟叔父林文明被地方官員殺害一案，上書要求皇帝平反。詳情參《劉壯肅公奏議》頁295〈請建林文察專祠摺〉，頁382〈奏雪林文明冤殺片〉兩文，「台灣文獻叢刊」本，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出版。

²³ 洪棄生寄長詩及信函給梁啟超的詳情，可參黃得時〈梁任公遊台考〉一文。

²⁴ 洪棄生出席4月2日梁啟超歡迎會，在《櫟社沿革志略》、《水竹居主人日記》都有記載。而他參加4月3日〈新荷〉一題的擊鉢吟會，則可在《辛亥年櫟社春會擊鉢吟錄》看到洪氏此題作品二首，這冊詩稿目前藏於台大圖書館特藏室。

²⁵ 施懿琳在與楊翠合著的《彰化縣文學發展史》書中（上冊，頁86-88），對此有所論述，其結論云：「雖然洪月樵對劉銘傳新政之理想，未盡了解；批評執政者的角度也不一定完全確當。但是，他的確是清代台灣詩歌史上難得一見，對反抗清廷者抱著深刻的同情，對生民表達了廣博關懷的文人。」（文見頁88），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關於此一問題，特別感謝施教授對筆者的提醒。

144、146、147，台灣大學圖書館出版，1998年11月。

²¹ 蔡惠如一首最後兩句原作：「鵲巢無奈鳩居久，勝國旌旗在眼中。」後來改作：「鳳麟卻被天驕識，佳傳修成播海東」不知是蔡惠如自己修改或詩友代改，筆者推測改的主因可能是原句將日本領台形容成「鳩佔鵲巢」，怕引來統治者之側目干涉而改定。

一、敘述語氣

本文所謂敘述語氣，是指詩人寫作時所流露的語氣、情調之趨向，大致而言，有的作品偏向以贊美的語氣，正面頌揚劉銘傳的功業，有的作品則偏向以悲涼的語氣，哀劉氏之壯志成空，以寄託對時代變局的強烈感慨；而有些作品，則同時兼融以上兩種敘述語氣合一，通常是先贊揚，再以感慨結尾。以下試舉詩例，就三種趨向加以分析，並探究敘述語氣與寫作的心理動機之關聯。

(一) 以贊頌為主

以黃潛淵、趙雲石、傅錫祺等人的作品為例，黃潛淵作品如下：

曾從海外寄干城，淮楚猶留宿將名。風鶴河山重創造，草雞壤土費經營。年輕鹽藪同游俠，身退名山自老成。憑弔西墳餘烈在，至今尚有口碑聲。

首句是指劉氏於中法戰爭時在台灣之戰績，次句追述其出淮軍，藉以暗指他平定捻賊、太平天國之亂的功勞，三、四句主要是贊揚其治台之貢獻。第五句述及劉氏年少時曾販賣私鹽，隱喻英雄不怕出身低，六句贊美其辭官歸隱的風範。結尾七、八句以死後口碑留傳至今，總結其一生成就。全詩敘述語氣，句句都是正面的贊揚肯定，並無悲歎成份。

又如趙雲石作品兩首中的第一首：

延平而後推人物，功業文章兩瑋瑰。草莽書生戎馬壯，雲臺儒將帶裘來。吳江戈甲塵秋日，瀛海乾坤造夏才。錦繡河山經緯在，新高高望幾徘徊。

起筆將劉氏與鄭成功並列為開台兩大人物，並肯定其功業和文章的雙重成就，此二句即全詩主旨所在。中間兩聯即扣緊「功業」和「文章」加以描寫：「書生」、「儒將」、「造夏才」是針對「文章」而發；「戎馬壯」、「雲臺」、「戈甲塵秋日」則是為切合「功業」而寫，結尾兩句以想像登上玉山（新高山），眺望台灣的河山之美收束，言劉氏經緯之功不可磨滅。全詩推崇極高，毫無抑鬱之色。

櫟社重要成員，自1917年起擔任社長近三十年的傅錫祺，其〈追懷劉壯肅公〉一首內容為：

立馬臺山第一峰，平蠻殺賊盛軍容。少年為俠希周處，中歲知音得蔡邕。詩自大潛傳百首，酒如淡水吸千鍾。燕然勒石尋常事，儒將風流豈易逢。

本詩一、二句頌其戰功，三、四句言其少年時有販私鹽、殺強豪等同游俠的事蹟，卻有如周處能棄惡從善，中年以後潛心讀書，博學如蔡邕。五、六句贊其詩才與豪氣。七、八句以「儒將風流」之贊語，稱美劉氏功業不朽。本詩第三句與前引黃潛淵詩的：「年輕鹽藪同游俠」相似，而同時贊美其功業、文章，又與趙雲石前述一首命意雷同，這三首詩，很顯然都是以推崇頌揚劉氏之功業為主旨，語氣偏向振奮昂揚。

其他如永烏蘇南、黃守謙、陳基六等人的七絕組詩，也都是以頌揚語氣為主調。由於七絕的篇幅短，詩人通常在一首詩中，專就劉氏某一方面表現加以推崇，試以櫟社社員陳基六的作品為例，其前四句內容是：

△二十從容戰陣諳，奇功屢次著江南。朝廷後先曾陞進，三等輕車一等男。（其一）

△欲將詩酒養疏頑，一博榮封便退閒。風雨十年讀書處，至今人說大潛山。（其二）

△狡夷思逞曾輕敵，一陷基隆戰欲迷。不料軍中猶有范，千秋膽破法蘭西。（其三）

△清丈田園建火車，餉源裕後練兵加。蒞臺防務誠周到，不愧當年政治家。（其四）

這組作品，依照劉銘傳一生重要事蹟的時間先後順序，分別加以頌揚。第一首是贊揚劉氏以少壯之年平定捻亂，屢建奇功，受封為一等男爵。第二首寫劉氏平定捻亂後，引退回故鄉，讀書於大潛山房的瀟灑從容與文采風流。第三首專寫1884年中法戰爭，劉氏在基隆、滬尾（淡水）的戰役中擊退法軍的英勇表現。第四首寫1885年台灣建省以後數年間，劉銘傳推行新政的具體貢獻，無負「政治家」之美名。這四首都是以贊頌語氣，對劉銘傳加以肯定。

(二) 以感慨為主

這類作品，其實是藉追懷劉銘傳的事功而寄託對台灣命運的關注。先

看署名「北郭園後人」七律一首：

莫向鯤溟問將才，滄田桑海有餘哀。秀離禾黍傷遺老，錦繡江山付劫灰。六載深謀資敵國，一時邊議罷輪臺。朱崖割棄英雄逝，往事傷心擲酒杯。

貫串全詩的是一股沉鬱厚重的歷史悲情，作者在詩中並未對劉氏功業多加著墨，而專就台灣淪為日本領土的滄桑鉅變抒哀，語氣悲涼。「六載深謀」是指劉銘傳在台灣六年（1885～1891）經營，「朱崖割棄英雄逝」則是指台灣割讓不久，劉氏隨即去世。值得注意的是：本詩五～七句似乎有受到梁啟超〈遊台灣追懷劉壯肅〉一詩的影響，其命意與思想意識也與梁啟超相似。²⁶詩中直接將日本稱為「敵國」，立場顯然是漢族意識為主導。

署名「元煌」（洪元煌？）的作品，也有相同的感慨語氣：

憶昔劉郎志已灰，大潛山下草成堆。鑿山冶鐵作馳道，俯海沿江築砲台。六載空籌安世策，一生枉抱濟時才。將軍去後風雲變，景福門前畫角哀。

這是作者同題兩首中的第一首，詩中除三、四句述及劉氏在台灣建鐵路、築海防砲台之外，其他六句，都是感慨劉氏建設台灣的努力已然成空，「志已灰」、「草成堆」、「空籌」、「枉抱」、「畫角哀」等字眼，共譜成一闕衰颯的哀歌。作者同題第二首亦云：「百里河山非我有，多情風月繫人愁。」也是為「江山易主」的慘痛史實深致浩歎！

鹿港詩人丁式周（1920年加入櫟社）的作品，對仗精切而語氣尤其悲涼：

海氛騷動寇東瀛，詔起將軍斧鉞征。柱可擎天悲末劫，戈難返日壞長城。六年未了生前事，三郡空傳身後名。惆悵大潛山下路，英靈憑弔不勝情。

起筆兩句，寫劉銘傳在中法戰爭中受詔防衛台灣，中間兩聯，對仗都

²⁶ 梁啟超〈遊台灣追懷劉壯肅〉分別有：「輪臺已罷開邊議」、「珠崖棄捐誰輸贏」、「君不見將軍嘔心六載功不就，翻以資敵成永寧。」等句。不過梁詩的「輪臺」一句是指新疆被俄國侵略，而本詩的「一時邊議罷輪臺」則應是指清廷甘心將台灣這個邊陲之地讓予日本。

是針對台灣淪日而發，「柱可擎天」是贊許劉氏之成就，但「悲末劫」使語氣為之一挫，哀台灣之被清廷割讓於日本，「戈難返日」更充滿強烈的無奈，意謂台灣割讓之局已無可挽回。五、六句，進而以「未了」、「空傳」的詞語表達強烈的遺憾之情。綜合上述，可知這類作品的感慨主題，都是扣緊台灣割讓給日本的時代變局而發。

（三）兼融兩者合一

除以上兩種截然不同敘述語氣之外，有不少作品則是兼融「贊頌」與「感慨」兩種語氣為一，通常是先頌揚劉銘傳的功業，再以感慨收尾。如新竹詩人林鍾英的作品：

當年投筆覓封侯，赫赫聲名大九州。十載戰功書露布，百篇詩句擅風流。治臺莫竟維新志，遺蹟空談善後謀。幾度滄桑人已杳，大潛霜葉墓門秋。

全詩語氣，前四句以頌揚為主，後四句則偏向感慨。至於內容所述不外是：舉其戰功、能詩、治台新政加以推崇，再感慨斯人已逝，壯志成空，可說集前述兩類的內容於一爐。又如陳基六所作本題五首中的第五首（前四首已見前）：

千古台陽兩偉人，鹿洲以外屬君身。滄桑劫後功猶在，一度追思一愴神。

前兩句將劉銘傳與藍鼎元（鹿洲）並列為「千古台陽兩偉人」，推崇極高，後兩句轉而以蒼涼的語氣，感慨世變滄桑而斯人已杳。

本題古體之作，由於篇幅較長，寫作手法多半都是先鋪陳劉氏之功業，再以感慨作結，風格從磅礴雄壯慢慢轉向低沉傷感而抑鬱。如黃溥造七古長篇，起筆四句是：

安徽山水亦奇絕，盤旋大氣森羅列。鍾靈獨萃壯肅公，勳名彪炳千秋烈。

其下詳述劉氏一生之重大事功，長達五十餘句，最後六句則是：

我來懷古空長歎，眼底河山棋局換。中原惆悵王氣殘，誰是公才排大難？驅車忍過合肥城，落日長江腸欲斷。

這種手法與敘述筆調，可說是詠史、懷古詩典型的寫作模式。類似寫法，又如魏國楨的七古一首，開頭作者以象徵手法，極力誇寫劉氏之英才特出：

怒潮翻空海水溢，風吹腥血賊氛疾。天遣神靈降嶽生，將才乃自合肥出。

接著在詳述劉氏事蹟並大加推崇之後，作者如此結束全詩：

嗚呼！公死於今十餘年，不堪回首憶當前。巍然治績兼戰績，赫赫猶如雷當天。如今家國與前別，秋風安灑將軍血。蒿目中原烽火迷，九原應知皆欲裂。

氣勢有如雷霆萬鈞，推崇之高則云「如雷當天」，感慨時代動亂，則云：「九原應知皆欲裂」，濃烈的筆觸散溢出強大的能量，撼動著讀者心靈。

黃溥造、魏國楨兩首七古的結尾，關注的焦點除了台灣，更擴及中國的政治鉅變——清朝覆、民國誕生之際的亂局。前引黃溥造的：「眼底河山棋局換」除了指日本領台，也可能指民國取代清朝，故其下句說：「中原惆悵王氣殘」，魏國楨的「如今家國與前別」同樣也兼指台灣、中國的政權更迭，並設想劉氏如地下有知對民國肇建之際的烽火連天，必然悲憤難以自己。這種內涵，反映出日治初期接受中國傳統詩書教育出身的台灣舊式文人，多半仍具有牢不可破的「故國情結」。

（四）敘述語氣與寫作心理動機的關聯

從以上的分析可進一步推測，其實詩人寫作時所流露的語氣，與其創作的心理動機有密切的關聯。當作者以贊揚語氣為主時，他的心理動機是傾向於歌頌一位傑出的歷史人物，在他們筆下，劉銘傳兼具了軍事家、政治家、文學家等數種很難同時並存於同一個人身上的多重角色，才識、能力、人品俱屬上乘，是亂世中的不世出的豪傑。事實上，這是出自文人理想典範的情感投射作用，以及動盪紛擾年代「英雄崇拜」的心理集體反映。

而當詩人以感慨語氣為主時，他的心理動機是被「感時憂國」的思想意識所主導，寫作者關注的其實是當前家國的劇變，他惋惜前人的壯志成空、光明前景不再，正是對現實所處的台灣政治環境的強烈不滿，對異族統治台灣的無奈與嗟歎。藉「弔古」之題，以抒發「傷今」之念，才是寫

作的真正目的。

至於敘述語氣兼融兩者合一者，作者在傾力刻劃劉氏的功業之後，不免以感歎台灣或中國的政治局勢、時代滄桑收尾。其心理動機既是基於出於對英雄人物的懷念，同時也是對當代時勢與政治的感懷，只是描寫的重心有的偏向贊揚，有的偏向感慨，略有差異而已。

二、書寫立場

細讀這些作品的內涵，可發現有兩種完全相反的書寫立場，一種是站在漢族的立場，以漢族意識為根本，藉懷念劉銘傳，暗中寄託亡台之悲痛。另一種則是接納日本統治台灣的事實，在贊美劉銘傳的同時，也肯定日本對台灣的建設成果。不過，除了上述兩種截然異趣的立場之外，也有的作品或游移於兩者之間，或淡化或刻意隱藏鮮明的發言位置。以詩評論古人古事的同時，作者也常對當代的政治環境、時事，表達其觀感。然而，為了避免觸犯政治禁忌，「不表態」或有所矛盾掙扎，也是一種自然的反應。以下試舉詩例詳論之。

（一）以漢族立場書寫，抗日意識強烈者

立場表達最鮮明，語氣最為強烈者，是出自1920年代台灣民族運動重要領導人之一的蔡惠如之作：

起舞聞雞紹祖風，揮戈落日可回東。早知塞把盧龍賣，應悔城增百雉雄。今日黍宮行路恨，當年銅柱伏波功。鵲巢無奈鳩居久，勝國旌旗在眼中。

這首詩在《櫟社十週年大會詩稿》原冊中，第二、五、六句有局部修改，七、八句則完全被刪去重寫。²⁷筆者這裡引用的是未修改前的原稿，因為原稿更能看出作者創作的本意及其發言位置。全詩最堪玩味的是：第三、四句，及七、八句。三、四句是說：劉銘傳如果早知台灣日後會被硬生生送給日本，他一定後悔當年對台灣的建設投入那麼多心力。其意旨與前引「北郭園後人」所寫的：「六載深謀資敵國」，及梁啟超〈遊台灣追懷劉

²⁷ 蔡惠如此詩修改後的內容如下：「起舞聞雞紹祖風，揮戈能返夕陽紅。早知塞把盧龍賣，應悔城增百雉雄。歧邑黍宮悲父老，朱崖銅柱憶元戎。鳳麟卻被天驕識，佳傳修成播海東。」筆者推測原來七、八句的刪去重寫，可能是原句的措詞太過強烈，為避免日本當局的側目、干涉而重寫。至於是惠如自己改定，或櫟社詩友代為修改，不得而知。

壯肅」一詩的：「君不見將軍嘔心六載功不就，翻以資敵成永寧」等句相似。這是以漢族立場為發言主體，族群意識十分清楚。七、八句，更進而將日本統治台灣形容成「鳩佔鵲巢」，仇日之情溢於言表。蔡惠如是櫟社詩人中，對抗日民族運動表現最積極投入的靈魂人物之一（另兩位是林幼春與林獻堂），這一首詩所反映的立場，與其在 1920 年代抗日民族運動中的作為，完全一致。

櫟社創始人林癡仙，此題之作屬七言古體詩，在前半首歌頌劉銘傳治台的成就之後，後半首他接著寫道：

燦爛黃金新世界，等閒擲過恆河外。空費經營一片心，彎弓六載扶桑挂。萬事人間總可哀，騎麟被髮莫歸來。匆匆海底揚塵後，聞說昆明亦劫灰。

前兩句，所謂「黃金新世界」是形容台灣在劉氏大力經營之下，已成一片光明燦爛的全新樂土，但如今卻被清廷有如沙土一般輕易棄擲。癡仙好友，也是櫟社詩人呂敦禮（1871～1908）曾有詩形容清廷割讓台灣為：「棄地渾如大漠沙」²⁸，癡仙此詩則以「恆河」暗示台灣在清廷眼中無足輕重，有如恆河之沙，棄之不足惜。「空費」二句，與前述蔡惠如詩：「早知塞把盧龍賣」二句意旨近似，「彎弓六載」指劉在台灣六年經營，「扶桑挂」則是指台灣終究為日本所奪取。結尾兩句，「海底揚塵」指台灣淪日，「昆明亦劫灰」則指中國也面臨鉅變，滿清正式滅亡，為中華民國取代。全詩後半首以感歎台灣為日本所攘奪為主旨，由台灣而兼及中國之政局變化，其發言位置也很明顯站在與日本對立的漢族立場，只是對日本領台一事，不像蔡惠如強烈語氣宣洩不滿而已。林癡仙原本以遺民自居，長期對中國時事保持關注，對台灣命運展開思索，他對日本治台有相當的抗拒，雖然不像蔡惠如、林獻堂、林幼春等櫟社成員，對民族運動投入甚深，但作品中的故國情結卻一直鮮明存在。²⁹

另一位出身鹿港的櫟社詩人施家本（嘯峰），同題之作是五言古體詩，詩中提及中法戰爭時，說：「光緒甲申役，西羌寇我壘。皇師出遠征，詔

²⁸ 此句出自呂敦禮〈感懷次邱仙根工部粵臺秋唱原韻八首〉中的第二首，見《厚菴遺草》頁六，龍文出版社「台灣先賢詩文集叢刊」第三輯，第九冊，新編頁數，頁 21。

²⁹ 詳參筆者博士論文《櫟社三家詩研究——林癡仙、林幼春、林獻堂》第二章，台灣師大國文研究所，1996 年 7 月。

起將軍視。」甲申即一八八四年，西羌指法國軍隊，這四句是指劉銘傳奉清廷之命，於中法戰爭時，在台督辦軍務，對抗法軍。「我壘」一詞，已清楚顯示其國族認同是中國。而本詩結尾是：

渾沌二百年，光彩自茲始。惜遭食肉妒，壯圖竟中止。大樹感風飄，江山非故址。今日臺政新，是公後塵耳。中原更多難，國步須經理。願得百劉公，去作中流砥。慕公為公歌，咨嗟空復爾。

最值得注意的是，在感慨「江山非故址」之餘，他雖不否認日本人治理台灣有一定的成績，但他認為日本人只不過延續劉銘傳過去建設台灣的成果而已：「今日臺政新，是公後塵耳。」這種觀點，與下文將引述的頌揚日本統治者的詩作形成鮮明的對照，最堪玩味。「中原更多難」以下四句，則是對當前中國的動盪，表達關注。

（二）認同日本統治，贊美劉銘傳，進而稱許日本治台成就

持這種立場的，可舉林石崖、魏清德、林文華等人的作品為代表。先看作品篇幅最短的七絕一首：

維新政策想當年，時勢推移世運遷。於今島治誇寰宇，應慰劉公未了緣。

這是出自林文華同題兩首中的第一首，第一句「維新政策」是指劉銘傳在台灣推行的新政，次句以平淡語氣述說日本領台是「時勢推移」的結果，似乎意指此乃理有必然。最令人驚訝的是三、四句，竟然稱贊日本對台灣的統治成績「誇寰宇」，對日本當局極盡阿諛之能事，其立場顯然已完全認同日本統治，並且深以為幸。作者進而主觀臆想：劉氏如果地下有知，對日本當局能承續他對台灣未完成的建設，達到「舉世無雙」（誇寰宇）的成果，應該也會感到欣慰吧！這種說法，與前文引述蔡惠如的「早知塞把盧龍賣，應悔城增百雉雄」，恰好呈現完全對立的立場。不過，此種說法，似乎是沿自日本人伊能嘉矩的記載，加以推衍而來。³⁰

³⁰ 伊能嘉矩《台灣文化志》上卷，提及李鴻章受命擔任代表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決定割讓台灣時，劉銘傳正臥病在床。李乃自天津致函在合肥家鄉養病的劉氏，問近狀後謂以：「台灣割讓之事，實為勢出於不得已，惟足下銳意經營之台灣之文明的設施，日人最悅之所，必繼承之，不可廢者也。仁兄多年盡瘁之治績，將長不銷滅，幸安心。」以上參中譯本《台灣文化志》上卷，頁 344，台灣省文獻會出版。

與林文華類似的觀點，在瀛社詩人林石崖的長詩中有更清楚的呈現，詩中以不短的篇幅刻畫劉銘傳「合肥古英雄，超然起布衣」、「環顧諸人皆寂默，獨公隆名泰岱高」的形象，全詩之末，作者寫道：

古人行道如青天，或彰身後或生前。往古來今雖異世，福民利國無後先。昆耶改隸十八春，文明設施如同揆。文物彰明寶庫開，九原有知應欣喜。行公之政已如此，韃人違公竟何似？新亭無淚泣銅駝，漢家盡復舊綱紀。從來時勢易變遷，唯有英雄與終始。英雄一去不復來，故人追念情無已。大潛山頭新日月，淡江城中新天地。日月光輝天地老，千秋萬秋永無異。

詩中強調的重點是：英雄「福民利國」的鉅大貢獻，是可以超越時勢變遷與政權更迭而永垂不朽的，為後人所懷念的。自「昆耶改隸十八春」以下四句，作者一方面對日本治台給予高度評價，一方面想像劉氏「九原有知應欣喜」，這與前述林文華：「於今島治誇寰宇，應慰劉公未了緣」的說法如出一轍，顯然是日本官方樂意接受的觀點。其實，吾人既然無法起劉氏於九泉之下，當然難以究詰劉氏對日本領台的觀感又如何？寫作者的言說，反映的不過其個人的政治立場與認同取向而已。接著，林石崖將日本在台政權與清朝做了有趣的比較，說：「行公之政已如此，韃人違公竟何似」，以「韃人」指稱寫詩當時已滅亡的清朝，並言「新亭無淚泣銅駝，漢家盡復舊綱紀」描寫革命成功，建立民國，套用革命黨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號召。這裡形容日本治台當局能延續劉銘傳的功業，反而是清室加以掣肘破壞，並進而呼應革命黨將清廷視為異族的觀點，言外之意正是認定：日本政府才是劉銘傳一生志業的繼承者，至於劉氏生前效忠的滿清皇朝是對不起劉氏的政權，覆亡本不足惜。全詩最後四句，他以「大潛山頭新日月，淡江城中新天地」暗示：台灣與中國都已擁有全新的政府，正開創出無限光明的前景。除了反映對民國成立後的美好期待，更宣示作者對日本統治台灣欣然接納的立場。

瀛社重要成員魏清德（1886～1964）的作品，反映的書寫立場表現得較為曲折，但與上述兩人也有近似之處。其詩前半，以描寫劉銘傳在平定太平天國之亂及中法戰爭中的英勇表現為主，當他述及中法戰役時，有如下的詩句：「當時法人豈不強，陸軍天下莫能當。白人忽挫黃人勝，是誰籌握疑張良」將劉氏在台指揮大局抵抗法軍，形容成像張良般的胸有成竹，

最值得注意的是「白人忽挫黃人勝」一語，形容中法戰爭是「黃種人」戰勝「白種人」，其背後目的似乎有意淡化中國與日本是異族對立的立場（日本人也是黃種人），以消解日本治台的種族矛盾。作者接著寫道馬關條約簽訂時，劉氏正臥病在床，但恐怕不免感歎台灣之割讓：「馬關關下關水流，合肥臥病鬼也愁。半生金線他人嫁，萬里青煙故國秋。」似乎仍有所感慨，然後他又述及武昌起義，推翻清廷，但民國建立的政局仍是一片亂象：「武昌一倡起如雲，二十八旗更漢幟……況復四圍瘴氣蒸，豺狼窺伺禍機伏。」但在此同時的台灣，則已是一片欣欣向榮的樂土，全詩如此收尾：

臺灣此日號昇平，萬般物質耀文明。男兒有幸酣春夢，女子無愁發曼聲。時安不厭方城去，政久驚看制度備。年年上巳赤鱗肥，歲歲春風紫燕至。麗正門頭風月微，照城電盞獨光輝。有懷壯肅無尋處，慚愧英雄是布衣。

在魏氏筆下，1912年的台灣已臻於世外桃源般的人間樂土，日本人將台灣建設得如此完美，一片歌舞昇平，更讓人感念劉銘傳當初為建設台灣奠定了如此完備的基礎。姑不論作者對日本治台的成就是否刻意加以美化，他完全不提台灣人對日本統治的不滿，顯然是一種「選擇性的遺忘」，其發言位置之向日本傾斜認同，甚至包括族群意識也以「黃種人」一語去異取同，這是否正是日本官方所期待的台灣人已被「同化」的表現呢？

（三）書寫立場游移者

另外有些詩人的書寫立場，游移於兩者之間，如以下二例。彰化田中地區士紳陳紹年的作品，詩中寫到台灣割讓的句子是：「割地難同合浦還，傷心故國之河山。慰藉殷殷煩李相，天南七省失重關。」言外有相當的感慨，但「慰藉殷殷煩李相」一語，明白採用前述伊能嘉矩的記錄，目的似乎要暗示日本人對台灣建設的用心投入。其詩對滿清並無微辭，提及劉氏死後之殊榮是：「建祠賜謚天恩渥，史館垂名帝寵頒。久著邊功酬聖主，恨無玉液駐朱顏」從這些帝制時代的用語：「天恩渥」、「帝寵」、「聖主」，可看出作者思想的保守。而其結語是：

回憶劉公巡撫日，鞠躬盡瘁慮無遺。而今已付東流水，鯤島新翻一局棋。倘尚雄飛雌伏未，臺灣時事獲維持。想無失鹿貽譏早，詎至亡羊

始悔遲。百代江山百代主，牛山流涕亦何為？撫番拓殖遺風在，鐵道猶存作口碑。

作者想像：如果劉銘傳在台灣的政策能完整推動，台灣未因劉氏辭職而使新政中止，那應可能就不至於被迫割讓給日本了，這種推論只能說是過於「想當然耳」式的單純期待，無法証成，但其書寫立場似乎仍從固有的漢族位置發聲，未向日本傾斜。然而，最後四句，他對日本統治台灣的現況採取的是：坦然接受，不想作無力的嗟歎流涕，因為「百代江山百代主」，政權更迭，人民無從選擇，能做的只有勇於面對現實生活罷了。最後二語：「撫番拓殖遺風在」，在緬懷劉氏之餘，也間接肯定日本當局延續劉氏政績的努力。綜合而言，其書寫立場是游移於前兩種不同傾向之間，選擇了折衷的發言位置。

桃園林國賓的五言古體一首，雖在書寫立場上未作明白的呈現，但也隱晦傳達他的游移位置，其詩起筆是：「台灣一乾坤，政治數三傑。成功闢草萊，後藤善施設。回憶廿年前，中有劉壯肅……。」以下即詳述劉氏功業。如果拋開族群立場不談，他提出台灣政治三傑是鄭成功、劉銘傳和後藤新平，分別代表明鄭、清領、日治三大階段奠定台灣發展的代表人物，不失持平之論。但他對後藤新平的直接肯定，在充滿堅定漢族意識、對日本統治採強烈抗拒立場的詩人筆下，絕對不可能出現。然後，本詩收尾，作者似乎又流露出殘存的些許漢族意識：

我生鯤島上，懷古欽芳徽。大江東逝水，我公去不歸。戍徹方城警，鴉飛圓山道。夕照問當年，白頭有故老。

前四句是懷古詩之常調，耐人尋味的是後四句，「戍徹方城警」應是指當年台北城防戍警備的城牆，如今已被日本拆除（徹，作「除去」解，通「撤」字），「鴉飛圓山道」是以蒼茫衰颯的寫景，暗示對日本統治台灣的無奈接受。「夕照問當年，白頭有故老」則充滿弔古傷今的淒涼感。綜合觀察全詩內容，開頭對後藤新平的肯定，和結尾的弔古傷今，似乎略有矛盾，作者的書寫立場，可說是在「堅守漢族立場」與「向日本傾斜」的兩極之間游移。

（四）不同書寫立場的政治與族群意識

以上三種不同的書寫立場，反映寫作者的政治與族群意識，以及對日

本治台當局所採取的距離：以漢族為本位的書寫立場，乃是出自強烈的我族意識，是日本為異族入侵者，對日本治台採取排斥抗拒的態度。而贊美劉銘傳，進而推崇日本治台成就者，則顯露出漢族意識的淡化或消解，對日本統治台灣，採取接納歡迎的態度，認同新的統治者。至於在兩者之間游移者，則反映出政治與族群意識的矛盾掙扎。

就上述作者來看，持第一種立場的蔡惠如、林癡仙、施家本都是櫟社成員，雖然櫟社成員未必全屬抗日，但相較於其他詩社，的確具備較鮮明的漢族意識，該社向來被認定是當時最具反抗精神的詩社，可說其來有自。

而向日本當局傾斜的作者中，魏清德、林石崖都是瀛社成員，瀛社最先是《台灣日日新報》漢文部的記者謝汝銓、林湘沅等人所發起，《台灣日日新報》本來就是日本官方媒體，故「親日形象」遂成為該社的明顯表徵。³¹魏清德在1910年入台灣日日新報社任職，後升任為漢文部主任。³²1927年瀛社首任社長洪以南去世後，謝汝銓接任社長、魏清德接任副社長，謝、魏兩人的親日作為更加明顯。根據《台灣日日新報》在大正十三年（1924）九月六日刊出的「瀛社題名錄」，在「舊社員」名單中，魏清德、林石崖分居第三、四位，僅次於洪以南、謝雪漁兩任社長之後。³³魏、林兩人在瀛社中的地位可見一斑。

至於本文前引同樣持相近立場的林文華，雖然曾是櫟社社員，但根據《櫟社沿革志略》的記載，他從1907年加入後，僅參加過1909年的一次詩會，而1919年條目下登錄當時社員名單時，特別注明林文華因未交基本金，早已喪失社員資格。³⁴可見林文華與櫟社的關係極其疏離，早已退出該社，可能因其立場與櫟社不一致有關。

另外，筆者所舉第三類之例的陳紹年，根據施懿琳的研究，陳紹年為前清秀才，日本領台之初曾避居大陸，次年應日人之請返台，因調停柯鐵之抗日行動有功，被日人委任為台中州參事，從此與日本當局建立良好關

³¹ 參黃美娥〈北臺第一大詩社——日治時期的瀛社及其活動〉，《第六屆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341-379，中央大學中文系出版，2000年3月。

³² 參詹雅能、黃美娥合編林鍾英詩集《梅鶴齋吟草》頁257，附錄二：「相關人物簡介」，新竹市立文化中心出版，1998年6月。

³³ 參同註31所引文，頁367、372。

³⁴ 參見傅錫祺《增補櫟社沿革志略》頁二，明治丁未四十年（1907），及頁七大正己未八年（1919）條目，興南新聞社昭和十八年（1943）出版。

係。³⁵ 施教授並根據陳紹年詩集手稿《壽山堂詩稿》，引述陳氏 1912 年所寫的〈和感時原韻〉四首的第一、四首，談到詩中的族群身份認同，而有以下評語：

在殖民政權統治下，與日本當局再友好，陳紹年還是未能捨棄身為漢人的標記。所以，他還是不忘在詩中表達希望炎黃子孫團結一心、共禦外侮的期待。這種身份認同的迷惑與徬徨，實乃被殖民者的無奈與悲哀。³⁶

此一論述，正為筆者前文述及陳紹年在「認同漢人身份」、與「向日本統治者傾斜」的兩極之間游移的書寫立場，提供精闢的分析和補充。

肆、劉銘傳的文學形象及其寫作手法

一、劉銘傳的文學形象

前已述及，本題作品既以「追懷」為主調，因此對劉銘傳完全採正面稱許肯定的態度，不難想見。劉氏在詩人筆下，究竟呈現何種樣貌呢？詩人常提到那些劉氏的事蹟呢？綜合觀察，論其事蹟，從早年的草莽出身、平定捻亂與太平天國之亂，到後來退隱家鄉讀書，乃至中法戰爭中的英勇表現，接著是擔任首任台灣巡撫治台的政績，更是最常被描寫的重點，最後，因受謗而去職，壯志未成的遺憾，也常見諸詩人筆下。對寫作者而言，由於劉銘傳是去世才十七年的「今之古人」，作者或親炙、或目睹、或耳聞，對劉氏為人及生平事蹟，都有一定程度的認識。但經過文學筆法的刻劃，自然加上不少的想像、改造或美化。論這些作品中的劉銘傳形象，可以歸納出以下幾個重點：一是「戰功彪炳」，二是「政績卓越」，三是「文采風流」，四是「壯志未酬」，五是「聲名不朽」。

（一）戰功彪炳

描寫戰功，包括早年平定長髮賊、捻亂、太平天國之亂，以及中法戰爭在台灣對抗法國軍隊，都是詩人一再歌頌的素材。詩人並無任何實際戰

³⁵ 參見施懿琳、林翠合著《彰化縣文學發展史》上冊，頁 100-101。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7 年 5 月。

³⁶ 參同前註，頁 101。

爭經驗，更沒有帶兵的能力，而劉氏平定內亂，抵抗外敵，英勇善戰，富於謀略，自然使詩人欽仰不已。在作品中，有的具體描述劉氏之征戰表現，有的概括其戰功。概括戰功者如林石崖云：「百戰成摧拉，中外安攘重。楚淮嘖嘖稱，豈曰非智勇」，具體描述征戰表現者更多，如魏清德之作起筆云：

人自尋砲彈，砲彈非尋人。男兒報國彈應避，夫何沙場有苦辛。秀全豎子不足道，忍害同胞致天討。法軍遭擊天亦快，獅球嶺上雲浩浩……。

所謂「人自尋砲彈」二語，相傳是劉氏在駐守基隆抵禦法軍攻擊，挺身於槍林彈雨之下，鼓舞士兵：「人自尋砲丸，決非砲丸尋人，苟忠勇義烈之心固，砲丸反而避吾也。」³⁷旨在突顯劉氏忠義精神及其過人之勇氣，接著述及太平天國之亂，及中法戰爭，生動刻劃劉氏視死如歸的英雄形象。又如陳瑚作品三首之三：

憶苦甲申歲，法夷寇南瀛。公自平髮賊，久歎脾肉生。英雄乘時勢，繫越更請纓。四郊刁斗急，虎帳夜不驚。勝敗乃常事，深謀功遂成。遂令彼金人，畏懼岳家兵……。

「四郊刁斗急，虎帳夜不驚」呈現的是一副指揮若定、從容備戰的大將風範。

署名「南溟」（可能是胡南溟？）的七律一首，藝術形象格外突出：

黑海濤雄一劍寒，北風吹斷（原註：指澎湖失守）鼓帆乾。七星屯衛中丞府，八卦旗高上將壇。一戰功成收滬尾，三軍血涌飲樓欄。中朝竟出和戎策，萬里孤臣老據鞍。

全詩純就中法戰爭著墨，以象徵筆法突顯劉氏克敵之英勇表現。前六句極力頌其神勇，後二句歎清廷之怯戰，與法國簽訂和約。

（二）政績卓越

劉銘傳在台灣主政六年（1885～1891），在台灣大力推行新政，包括內政：清賦事業、開山撫番，交通（建設鐵路、郵政、電燈、電報）、鞏固海防，為台灣奠定現代化的基礎，甚至遠遠超過當時中國各省。身為台

³⁷ 參見中譯本伊能嘉矩《台灣文化志》上卷，頁 343，台灣省文獻會出版。

灣詩人，這些作者對劉氏建設台灣的努力，不吝給予極高的推崇。

如林獻堂五言排律一首，後半述及劉氏治台成就：

戎軒淹此土，鎖鑰綰東隅。牛酒蠻墟集，航檣估舶趨。舟車通險阻，
阡陌闢膏腴。草野謳歌在，滄桑今古殊。飄零看大樹，還有鶴來無！

分別描述劉氏在台致力海防事業、航運貿易、交通建設、土地清丈政策的推動及成效，令台人懷念不已。又如傅仲輝的五言古體一首，歷數劉氏在台政績有：

銳意開疆域，加增府與縣。修文造國器，偃武防備焉。清丈改租制，
田園開陌阡。撫蕃亦邦本，恩威亦濟全。後重而致遠，羈車（筆者按：
即指火車）力萬千。千里通消息，電信作郵傳。煥然新政治，法役淨
烽煙。臺海金湯固，惟是公之賢。嗟哉公已沒，政績垂萬年。……

作者此詩比前述林獻堂詩更詳細鋪寫劉氏的新政建設，當然，同樣少不了刻意的美化、誇大化，如清賦執行過程的草率及其紛爭，「撫蕃」事業的實際成效有限³⁸，在詩中或捨去不談，或誇大成果。因為詩人寫作的目的，是著眼於劉氏的正面貢獻，作者甚至推崇劉氏「政績垂萬年」，敬仰之忱，不難想見。其他類似的描寫仍多，如林國賓詩云：「鐵道圖交通，生蕃勤撫育。清賦與辨防，刷新人耳目。」再看林震東詩云：

撫蕃開墾與清賦，悉合西法之理財。輪船鐵道并建省，規模宏遠交通
開。振興扼要諸教育，造成棧樸濟時才。經營締造時雖暫，面目早已
新全臺。流風善政堪千古，甘棠端合到處栽。仙山今日璀璨地，劉公
廿載已胚胎……。

林震東提到了除了清賦、開山撫蕃、交通、建省，並強調劉氏在教育上的貢獻，並認為今日台灣的建設發展，是廿年前劉氏奠定的基礎，這種說法，幾乎可說是當時的共見，前文已有所引述。總言之，這些作品全對劉氏之政績，推服備至。

（三）文采風流

³⁸ 詳參黃秀政、黃文德〈首任台灣巡撫劉銘傳去職研究〉第三節「劉氏在台推動新政的得失」出處同註17。

劉銘傳雖是武將出身，卻能詩能文，在台時又以巡撫兼理學政，提拔不少台灣本地人才。他的文學時表現，突破傳統武將格局，因而也成為台灣文人贊賞的特質之一。據伊能嘉矩說，劉氏在基隆獅球嶺駐守時：「前軍之敗報荐至之時，悠然在幃幕中賦詩示餘裕，兵勇見之咸安心。蓋擬橫槊賦詩，可能取鼓舞士氣之術策。」³⁹此一形象，經過文人美化，就成了：「樓船十萬下東瀛，橫江一槊吟風清」（謝石秋詩），更常見的則是推許其詩文成就，如林湘沅作品：

漫將武將掩詩名，咳唾隨風珠玉成。試取文章歌一讀（原註：公著有
大潛山房詩鈔，中有文章歌語多感慨），可知公是一書生。

作者對劉氏詩作之激賞，進而引發其「身份認同」，認為劉氏之詩名被武將之身份所掩，並由劉氏詩作之出色，想見他其實也是跟作者一樣是「書生」本色。這恐怕是出自作者個人的移情作用吧！

櫟社詩人陳瑚有本題五言古體三首，其中第二首，特別為劉氏兼理學政一事辨誣，認為劉氏文武兼備，以武將出身，雖無科舉功名，但兼掌學政、主持科考，都能大公無私，而其詩文成就，亦矯然特出：

天下方用兵，武士苦征戰。太平竟何如，文臣蒙寵眷。未聞甲冑身，
而能親筆硯。驍勇縱絕倫，亦為世所賤。學使宰文衡，職本文臣擅。
朝廷並付公，成例始一變。越俎而代庖，訾議遐邇徧。如何一武夫，
覲顏入試院。公豈有所私？公亦何所戀？取士秉大公，知賢亟登薦。
韜略與詞章，矯然異時彥。豈惟畫凌煙，可入文苑傳。讀公歸隱詩，
百首猶忘倦。持謝世俗儒，曉曉何管見。

內容述及劉氏以武將出身，兼理學政所引起的批評，作者除了對劉氏提拔人才大公無私之風範，大表贊賞，更進而高度推崇其詞章成就，迥異於流俗，有個人面目，可入正史「文苑傳」，意謂其傑出之文學表現，亦堪留名後世。

（四）壯志未酬

劉氏在台之政績固然出色，但由於諸多因素，如險惡複雜的政局、個人身體之極度耗損、其個性與人際關係的限制，都使他在推動新政的過程

³⁹ 出處同註37。

中，橫生不少障礙。最後不得不再三請辭，終於獲准。⁴⁰

劉銘傳的辭職，其實有來自個人、人際、時代的複雜原因，但是在台灣詩人筆下，通常只為劉氏之壯志未酬深感遺憾，而將因素簡單化為：小人阻撓，因受謗而黯然去職，這當然也是出自對劉氏的過度崇拜的心理使然。

如莊雲從本題七言律詩三首中的第三首：

海邦坐鎮不揚波，忽卸朝衫隱薜蘿。奇士從來招謗易，英雄自古感時多。經綸未展調羹手，老病難揮返日戈。和議局成身亦死，可憐破碎舊山河。

就詩藝論，本詩風格蒼勁雄渾，文氣運轉自如，充滿悲壯之美感，可說是水準以上之佳作。詩中將劉氏去職原因，簡化為「奇士從來招謗易」，感歎其新政功業之未成，而其老病之身，終究無力挽回台灣被迫割讓之事實。尤其劉氏亡故，正是在終日簽訂馬關條約，割台已成定局之後不久，誠令人思之撫然，為台灣命運，也為劉氏半生事業成空，同聲一哭！作者之結尾極富感染力，時代滄桑感表現得格外動人。不過本詩對劉氏壯志未酬的去職原因，卻有簡化之嫌。

林石崖長詩一首，對劉氏去職前後的描寫則是：

……藍氏理想正實行，一瀉千里無所顧。中原黯淡故步封，振臂疾呼能有幾。蜀日越雪怪嘯嘯？如公何能逃訾誹。大吏小人見掣肘，故人變法背蕭曹。……

先推崇劉氏能將藍鼎元當年所提出建設台灣的理想付諸實現，再批評中國本土故步自封，朝中阻撓力量之大。如果對照劉氏先後曾遭左宗棠、慶親王奕劻等糾正、彈劾，以及支持劉氏最力的醇親王病重後，朝中其他派系對劉氏新政的攻擊等相關歷史來看，劉氏被「大吏小人」掣肘阻撓的確是事實。但劉氏推行新政的一些顯著缺失，以及他個人健康的急遽惡化，都被完全略去不提了，而這些其實也都是劉氏堅持去職的重要原因。

（五）聲名不朽

在推崇劉氏功業之餘，這些作者每每也為劉氏尋求歷史定位，而將他

⁴⁰ 參同註38，第四節「劉氏在台推動新政的困難及阻力」，第五節「劉氏去職經過與原因」。

提昇到極高的位階。尤其常見方式，是將劉氏與台灣開發史上的重要人物相提並論，確認他在台灣史上的顯赫地位與不朽聲名。較常被與劉氏相提並論的人物，包括鄭成功、藍鼎元、後藤新平等。如以下各例。

與鄭成功並論的，如林湘沅作品：

論定新朝分外榮，有人為比鄭延平。英靈地下應無恨，人物流傳兩大名。（原註：日本政治家以鄭延平與公為台灣兩大人物）

這是林湘沅本題七絕四首中的最後一首，作者在同題七言古體一首中也說：「自從改隸得榮評，競傳兩大人物名」，都是引用「日本政治家」之說，認為劉銘傳建設台灣、與鄭成功入台，可以並列為台灣史上的「兩大人物」。又如前引趙雲石詩：「延平而後推人物，功業文章兩瑋瑰」取意相同。

與藍鼎元並論的，如陳基六的「千古台陽兩偉人，鹿洲以外屬君身」，鄭作型的：「大名已自重鯤島，善政端因效鹿洲」，永島蘇南詩云：「藍子善圖劉實施」、林石崖前引詩作亦曾說：「藍氏理想今實行」。藍鼎元（1680～1733）在清康熙六十年（1721）隨族人藍廷珍來台參與收平朱一貴之亂。在台期間，主張積極開發台灣，當時他的建議雖未被採納，卻成為日後治台的重要參考，並有部分獲得實現。⁴¹

至於與後藤新平並論的，則已見前文引述林國賓之詩：「台灣一乾坤，政治數三傑。成功闢草萊，後藤善施設。回憶廿年前，中有劉壯肅。」

更多作品肯定劉銘傳的貢獻，可永垂不朽，如張玉書詩云：「丹青合繪凌煙閣，留得千秋不朽名」，傅仲輝詩云：「嗟哉公已沒，政績垂萬年」，陳瑚詩則說：「斯人已不見，治蹟猶分明。創始昇後人，文獻有餘榮。」陳貫詩也肯定其典範長存：「朱崖久不屬中原，剩有摩天一銅柱」，林震東七古長篇則再三對劉氏推崇備至：「英雄雖化一坏土，遺澤長隨萬古存。時事多艱哲人萎，崑山誰招故子魂。……」

總結上述，可知此題諸作所刻劃的劉銘傳形象，可說是一位不世出的英雄豪傑，他不但文武全才，而且政績卓越，對台灣建設尤其不遺餘力，

⁴¹ 詳參黃秀政〈論藍鼎元的積極治台主張〉，《台灣文獻》28卷2期，1977年6月。楊雲萍〈藍鹿洲的台灣統治論〉，收入《南明研究與台灣文化》，頁735-740，台灣風物雜誌出版，1993年10月。及藍國榮《藍鼎元研究》，高雄師大國文所碩士論文，1980元。

而他最後主動請辭離台，乃是因受謗而壯志未酬。然而，終究劉氏的英名已足以永垂不朽。這當中，固然有不少是有事實根據，但也加上不少詩人創作時的主觀想像、誇大美化，或刻意的剪裁，「文學描寫的劉銘傳」與「歷史上的劉銘傳」究竟有多少吻合之處？又有多少落差？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詩人描寫銘傳的常用手法又是什麼？以下，即進一步針對詩人描寫劉銘傳文學形象的常用手法略作討論。

二、描寫劉銘傳的常用手法

論描寫劉銘傳的常用手法，筆者擬歸納為兩點：一是「簡單化」、二是「誇大化」。

（一）簡單化

簡單化，是以詩詠人、詠事必然的手段之一。因為詩歌的篇幅較短，無法容納太多文字，因此將事件高度濃縮，只摘取相關事蹟的局部片段，予以概括式的呈現，乃是不得不然的選擇。以本題詠劉銘傳諸作為例，如前已述及，不少作品都為劉氏壯志未酬而離台抱憾，而多半只將原因歸咎為受謗、被人掣肘，完全無人從劉氏本人一再強調的身體健康之嚴重受損⁴²的角度來書寫。以下再以劉銘傳最被後人津津樂道的「清賦」一事為例，觀察詩人如何「簡單化」的手法，來描寫劉銘傳。

本題作品，述及劉氏清賦之成就者甚多，絕大多數只是以一、兩句加以歌頌，如「清賦強兵計，防邊老將才」（林慶賢）、「清賦與辨防，刷新人耳目」（林國賓）、「撫蕃未就先清賦」（陳織雲）、「量盡山田深設計」（弘農生）、「量田苦費幾年功」（佚名）、「清丈敷鐵次第施（湘

⁴² 劉銘傳早年在大陸掃蕩內亂時，即已罹患眼疾，在台灣擔任巡撫數年期間，因政務繁忙、水土不服等因素而使眼疾加重，甚至引發頭痛、肝病，後來又加上雙耳全聾，經治療後，只能用右眼右耳。自1890年五月起他先要求朝廷准其休假養病，接著同年七月首度以病重理由請辭未准，十月再度請辭，自言：「百病叢生，精神頹靡，公牘不能閱看，見客倦於言語，偶一用心，略血頭昏，幾若身非己有。元氣虧損，斷非一時所能驟痊。」次年（1891）元月七日，劉氏三度請辭，〈三請開缺摺〉中有言：「伏念臣到台七載，竭蹶艱難，今春始將內治大端，經營就理，尚有省城並鐵道未竟之工，若非病勢沉重，萬難支持，縱不戀祿位之榮，安忍棄垂成之績？」以下並詳述病情轉劇之情形。朝廷的回應是：准予休假三個月，台灣科考事宜由唐景崧代理。四月十二日，劉氏四度請辭，力言病重將耽誤政務推展。五月朝廷終於准其辭職。可見身體健康之惡化，確實是劉氏堅決求去的主因之一。以上詳參《劉壯肅公奏議》卷一「出處略」：〈因病懇請開缺摺〉、〈再請開缺摺〉、〈三請開缺摺〉、〈奉旨革留謝摺〉、〈四請開缺摺〉等文，頁114-118，台灣銀行「台灣文獻叢刊」本。

沅）、「練兵撫蕃更清賦」（林石崖）、「清丈改租制，田園開陌阡」（傅仲輝）等均是，以上這些作品對實際執行清丈工作的基層官員因清丈不實而引起的弊端，甚至導致彰化施九緞起事，都省略不提。至於少數作品，雖曾述及清賦之紛爭，但描述也是極其簡單，未究原委，反映的大抵未脫離制式的「官方觀點」。如以下各例：

黃守謙的七絕一首專詠清賦：

外府臺疆藏物多，圖將利藪盡陞科。蚩蚩未解供王義，抵抗哆然斥政苛。

詩中前兩句主張開發土地物產，必須以「陞科」（即升科，指新開發土地向政府繳納稅賦）方式，增加政府財源，才能促進國家建設，所言無可質疑，但後兩句將民間反抗的行為，簡單化的為民眾「未解供王義」的結果，認定民心不服（哆然），批評清賦為苛政，是無知之舉。這完全是站在官方立場發言，對當時清賦引起民間反抗的癥結點，若不是不了解，便是有意為官府掩飾。

根據歷史學者的研究，清賦過程引發不少責難，諸如用人失當、丈量方法不完整、只求時效，使清賦的政策流於粗糙，加重人民賦稅負擔，清丈對象的差別待遇等，都是受到民間不少的質疑。⁴³其中的複雜因素，當然不是「民眾無知」一語可以含糊解釋的。

陳瑚五古三首之三，曾提及因彰化知縣李嘉棠執行清丈不當，引起民怨，彰化二林人施九緞率眾反抗一事，但詩中相關的描述是：

頑民忽梗化，揭竿輟芸耕。即為堯舜民，寧免租稅征。處士亦橫議，時作不平鳴。用夷以變夏，毋乃妄譏評……。

將起事民眾，視為「頑民」，蓄意阻撓政策之推展（梗化），這種官府威權式用詞，反映上位者的偏執立場，當然無助於理解問題所在及民眾心聲。黃守謙、陳瑚似乎都把問題簡單化約為：民眾拒絕繳納土地賦稅，這是無知的反叛行為。他們在詩中不曾真正去探討民怨發生的原因，自然

⁴³ 參見李國祁《中國現代化區域研究——閩浙臺地區，一八六〇—一九一六》，頁195（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出版，1892年）；許雪姬〈邵友濂與台灣的自強新政〉，《清季自強運動研討會論文集》，頁429，中研院近史所出版，1988年。

也看不到「非官方觀點」的評斷了。在同一種思考模式之下，這些作品的作者只是複述官方用語，稱民眾「蚩蚩」（擾亂的樣子，或癡呆貌）、為「頑民」、為「寇」（如林鍾英詩：「清賦無心動寇氛」）。似乎不如像洪棄生、吳德功，甚至更後起的賴和，對起事民眾有更深刻的同情和理解。

（二）誇大化

這些作品常用的另一手法是「誇大化」，文學表現必須藉助想像，即使是像描寫劉銘傳這樣距離寫作者年代甚近的歷史人物，當然也少不了想像。而為了歌頌這位傳統文人心目中的「英雄典範」，詩人常見手法便是以誇大的形容，彰顯劉銘傳的才能、事功、乃至人格，幾乎已達到無可企及的完美境界。

如描寫劉銘傳的允文允武，趙雲石詩云：

文章歌罷去從戎，吐氣書生爵上公。失路英雄半屠狗，鑽經癩蠹總雕蟲。勳名馬上無文弱，風騷雅人有武功。畢竟賦詩能退賊，筆光劍氣尚熊熊。

最妙的是結尾兩句：「賦詩能退賊」的誇大描寫，而「筆光劍氣尚熊熊」更宛如超現實的魔幻手法，充滿誇飾、虛誕的趣味性。

又如林石崖七古長詩一首，提及劉氏新政受阻而辭職，其內容是：

大吏小人見掣肘，故人變法背蕭曹。環顧諸人皆寂默，獨公隆名泰岱高。丹山彩鳳未高飛，藩籬鷄雀誰能測？一旦翱翔入杳冥，絕雲負天看不得……。

此處所言對劉銘傳「掣肘」的「大吏」應該包括左宗棠在內，「故人變法背蕭曹」指邵友濂（為劉任巡撫時期的重要幕僚）未能持續推行新政。至少左宗棠之盛名並未在劉氏之下，謂之「環顧諸人皆寂默，獨公隆名泰岱高」，未免過於誇大。而以「彩鳳」和「鷄雀」的對比，譬喻劉氏與其反對勢力的胸襟器識之別，也是文學浪漫化的誇大技巧。

伍、異質詩作的對照閱讀——另一種觀點看劉銘傳

以上相關作品，雖然作者的敘述語氣與書寫立場都各有不同，但詩人對劉銘傳的評價都是高度肯定、而加以極力歌頌或緬懷，以致筆下的劉銘

傳形象，是如此完美無缺。除了這一面倒的肯定態度之外，我們可以發現從晚清到日治時期的詩人，仍有少數「異質聲音」的存在，提供吾人另一種視角，藉以思索評斷歷史人物事蹟時可能蘊藏的複雜面相。對劉銘傳新政批評最力的台灣古典詩人，應該是鹿港的洪棄生。其次，丘逢甲和吳德功雖未直接批評新政，但也有相關敘述可以參考。至於更晚期的賴和，一向是深具人道的胸懷，每藉寫作為弱勢的庶民大眾鳴不平，他也有兩首與劉銘傳有關的詩作，可以對照閱讀。以下先談丘逢甲、吳德功、賴和三人之相關詩作，最後再談洪棄生。

一、丘逢甲

丘逢甲早年在台灣所寫的《柏莊詩草》中，有〈台北秋感〉一題三首，其中第二首曾提及劉銘傳新政⁴⁴：西風江上水微波，十載征人七度過。出海生涯茶市減，入城租稅稻田多。雷車電索蠻夷氣，越調閩腔婦女歌。郭外尋秋划蟒甲，劍潭老樹正婆婆。這首詩約寫於1892年，劉銘傳離台之次年，題材是寫台北的地理風土。其中「出海生涯茶市減，入城租稅稻田多」及「雷車電索蠻夷氣」等語，雖不是為批評劉銘傳新政而發，而主要是著眼於台北地區的經濟貿易及交通發展，甚至憂心外國勢力在台灣擴張。但從「茶市減」、「入城租稅稻田多」、「雷車電索蠻夷氣」等所流露的語氣，細加揣摩，卻隱約感覺他對劉銘傳在台灣推行新政的成效，似乎持相當的保留態度。「出海生涯茶市減」，意謂指以茶為主要出口產品的對外貿易，因不敵外來商船，使茶市漸趨沒落。「入城租稅稻田多」表面似乎是說：經過劉銘傳主持下的清丈工作，城中稻田增加不少，但同時「租稅」也跟著增多，似乎才是作者要表達的重點。「雷車電索」指的是劉銘傳鋪設鐵路，但加上「蠻夷氣」三字，語意頗為隱晦難解，筆者認為可能是指：當初台灣鋪設鐵路，從實際設計、測量、路線稽查等全是仰賴外國人之手⁴⁵。作者對當時引進西方科技文明建設不得不傾賴西洋人，有深刻的憂心，蓋中國倘無法自立自強，將來如何抵禦外國勢力之入侵台灣呢？綜合言之，丘逢甲從字裡行間所流露的心境，雖然並未直接批評劉銘傳的新政，但他

⁴⁴ 見丘逢甲《柏莊詩草》頁104，陳炎正編訂出版，1978年。

⁴⁵ 參見中譯本伊能嘉矩《台灣文化志》中卷第三章〈通信〉之第四節「鐵路」，頁429。據該書所載，劉銘傳鋪設鐵路，最初設計人是德國人，至於稽查路線主任、機關監督、營業顧問，都分別由三個英國人出任。

因憂心台灣的現況及未來，面對劉之開港、清賦及鐵路建設之成效與後果，似乎有相當的保留。

二、吳德功

吳德功是另一個有趣的例子，在〈追懷劉壯肅〉諸作的原始出處《櫟社十週年大會詩稿》中，其實也有吳德功的詩，但他只寫了〈北港進香詞〉五首七絕，和〈祝櫟社十週年大會〉七絕二首，卻沒有像絕大多數作者同時也寫〈追懷劉壯肅〉一題，筆者推測，這可能是因為他個人對劉銘傳的評價也有相當的保留，而不願違反個人主觀意志，附和眾說，勉強賦詩。

日本領台之前，他已在《施案紀略》一書中詳述 1888 年施九緞起事的發生原因、事件經過，以及他親自參與在官府和民間折衝奔走，以避免事端擴大的過程。他很清楚事件發生，乃因彰化知縣李嘉棠執行清丈之草率而引起之民怨，在該書〈自序〉中他曾提及，對施九緞起事，「起筆大書圍城，繼以索焚丈單，明其非故作不軌也」⁴⁶書中並提及，因李嘉棠為自己開脫，誣指教諭周長庚與鹿港士紳朋比為奸，與官府作對，劉銘傳乃下令拘留周長庚到台北問訊。周長庚得吳德功三百元義助，倉促潛逃回福建。此事他另有〈周莘仲廣文遭難記〉一文記其本末，附於《施案紀略》之後。文中吳德功極力稱贊周長庚之為人，並為周長庚抱屈，言外對劉銘傳之失察頗有微辭。⁴⁷

根據上述，筆者推想：吳德功在施九緞事件發生時隔已廿四之久的 1912 年，想必記憶猶新，因此該年當櫟社為慶祝成立十週年而以〈笨港進香詞〉、〈追懷劉壯肅〉二題徵詩時，吳德功只寫前題而不寫後題，個中因素也就不難索解了。

另外，他在《瑞桃齋詩稿》中有兩首描寫坐火車的經驗，一首是五言古體〈新竹坐火輪車往台北〉，另一首是〈獅球嶺開地道以通火輪車〉。前一首，他對鐵路開設，火車行駛帶來的便捷，大表贊歎。但也對鋪設過程中的艱辛和死難者表達不忍：「築造輪車路，沿山削破碎。疫症時流行，兵弁多病斃。開闢三年中，死者難計數。」全詩結尾，他不忘提醒當局須注意施工之品質，以維安全：「但恐山谷崩，失足防蹶躓。冀望賢長官，

⁴⁶ 見吳德功《施案紀略·自序》，收入台灣省文獻會出版之《吳德功先生全集》合輯一冊中，1992 年 5 月出版。

⁴⁷ 吳德功〈周莘仲廣文遭難記〉附於《施案紀略》全書之末。

籌畫策周備。」

另一首寫獅球嶺開鑿鐵路隧道，他除了贊歎「險越高山上，塗穿大地中」，更擔心「可憐天塹失，何恃保瀛東」，獅球嶺本是中法戰爭中抵抗法軍入侵的重要據點，如今隧道貫穿山而過，以通行火車，固然帶來便捷，也可能為外敵入侵大開方便之門。吳德功的憂慮，並不僅僅是保守心態的反映。

綜合上述，吳德功在清領時期對鐵路建設，在驚歎之餘，他關心的焦點卻也包括民眾安危、死難者眾、和軍事防備上的可能後遺症，並非全然稱頌。在《施案紀略》中，他對清丈的執行缺失，據事直寫，對劉略有隱微批評。因此，日治時期他不寫〈追懷劉壯肅〉，或許正是他對劉銘傳某種「無言的抗議」。

三、賴和

比較特別的是賴和的詩例，賴和在從事新文學創作之前，已有不少的古典詩創作經驗。本文在「前言」中已提及：1922 年《台灣》曾以「劉銘傳」為題舉辦徵詩，賴和以「懶雲」筆名入選兩首作品，分別是第二名、第十三名，第二首全詩都是推崇劉銘傳，但第十三名，在贊揚中卻似乎略有批評：⁴⁸

吳下何人識阿蒙，治台誰諒此心衷。升科未盡安邊策，清野能成禦寇功。化外番夷皆赤子，時來草澤起英雄。山河換後規模在，霸氣依然溢海東。

其中三、四句語意較模糊，「禦寇」可能是指中法戰爭擊退法軍而言，因「清野」是指作戰時將戰區物資人口撤走，使敵人無從掠奪而言。而「升科」一句，可能即暗指因清賦而引起的紛爭，甚至造成施九緞起事，故云：「未盡安邊策」。此句即使不是批評劉銘傳，至少也有相當的感慨、惋惜之意，言外似乎對清賦政策執行過程的缺失感到遺憾。

在〈劉銘傳〉二首發表後的不久，賴和又以「逸民」的筆名在《台灣》

⁴⁸ 賴和以「懶雲」筆名發表的〈劉銘傳〉二首，原發表於《台灣》雜誌第三年第三號，頁 43-44，1922 年 6 月出版。《賴和先生全集》（明潭出版社）、《賴和漢詩初編》（彰化縣文化中心出版）、《賴和全集·漢詩卷》（前衛出版社）均有收錄。

雜誌發表〈讀台史雜感〉組詩⁴⁹，其中第五首內容是：

潮春九段一時英，忽地干戈起不平。今日定軍山下路，冤燐點點竹根生。

第一句將戴潮春、施九緞（原詩誤作「段」字）相提並論，稱許他們都是一時英豪，推翻過去官方將兩人定位為亂賊的觀點，認為他們是因「不平」而起事，雖不幸為官軍掃蕩、平定，死後猶含恨九泉。本詩是賴和為受壓迫之民眾鳴不平，展現賴和一貫為弱勢者發聲的人道精神。詩中雖未批評劉銘傳，但肯定施九緞也等於批判當時官方清賦政策執行的缺失。

四、洪棄生

洪棄生是台灣詩人以詩作批評劉銘傳最力者，洪棄生批判劉銘傳新政的作品，主要有〈蒿目行〉、〈鐵車路〉、〈機器局〉、〈西洋燈〉等。

綜合探討這些作品的內容，反映出洪棄生的思想特質，可以從正反兩面來討論。從正面來說，他能站在庶民大眾的立場，勇於批判執政者之缺失，以及對無助百姓的壓迫。以「施九緞事件」為題材的〈蒿目行〉一首，即是最顯著之詩例。但從反面來看，洪棄生過度固守「我族中心主義」的立場，對西方科技文明引進的實業建設，都採取相當排斥的態度，以現代觀點來看，恐怕難逃「固陋」之譏。因此，他對劉銘傳的批評，有的是基於為民眾申冤的人道關懷，值得肯定；有的卻是因為對西方科技文明的認識不足，以及對傳統文化的過度自信崇拜，批評未必得當。

〈蒿目行〉一首，屬七言古體，長達三十八句，起筆即記錄施九緞事件之時間、起因、進而直言譏刺劉銘傳：⁵⁰

歲在戊子月在酉，地上機槍天簪帚。社鼠野狐哀嗷嗷，一隊健兒負挺

⁴⁹ 賴和以「逸民」為筆名發表的〈讀台史雜詠〉組詩，見《台灣》第三年第四號，頁51-52，1922年7月出版。筆者多年前撰寫〈林幼春、賴和與台灣文學〉（見《文學台灣》第十七期，1996年1月）時，對照《賴和漢詩初編》頁254-256，才發現「逸民」就是賴和，《初編》本（題為〈讀台灣通史十首〉）所收為賴和手稿，比發表於《台灣》者，多出四首；但《台灣》所刊出有一首未見於《初編》本，而且兩種版本詩句內容頗有不同，如本文所引「潮春九段一時英」一首，在《初編》本中作：「戴潮春亦一時英，薨地干戈起不平。今日定軍山下路，冤燐夜夜竹根生。」並未提到施九緞。

⁵⁰ 以下引述洪棄生〈蒿目行〉、〈鐵車路〉、〈機器局〉、〈西洋燈〉等詩，分別見於洪棄生《寄鶴齋詩集》所收之〈謔譏集〉卷三、卷四，台灣省文獻會出版，1993年5月。

走。蠻煙細民無異志，只因新令掊克苟。新令之條行者誰？劉公銘傳來撫守。自請住臺過十年，翦除荊榛使財阜。去歲勸番勸不成，遂向民間增稅畝。一方田畝十數弓，丈量比前長八九。累鎰積銖算不遺，官乃與民爭利藪。不為朝廷培本根，斲喪元氣焉能久。區區彈丸何足言，坐使皇朝傷高厚。農夫商賈不聊生，紛紛痛心又疾首。浙東計畝為公田，南或呼箕北呼斗。傳說昨日已打城，無乃跳梁成芻狗。揭竿作旗搶地呼，背負耒耨擊土缶。肉食無心為蒼生，腹削依然故見狃。古人不畜聚斂臣，此言真堪銘鼎卣。赤城千里如金甌，無故尋端欲碎剖。不知禍水何時平，老范甲兵胸豈有。九重高遠未曾知，萬民淚落秋風柳。

從起筆到「只因新令掊克苟」，是記錄事件發生時間及起因。自「新令之條」一句以下，直接批評劉銘傳，進而詳述官府執行清丈不實、與民爭利，使民不聊生，痛心疾首，乃憤而挺身反抗官府。「肉食無心」以下，以極犀利之文字，指責貪官污吏之橫行霸道，是導致事件一發不可收拾的罪魁禍首。最後數句，憂心禍事何時能平，萬民為此受累，苦不堪言。洪氏在本詩中，很真切地描寫民眾的無辜與痛苦心理，以及劣吏之惡形惡狀，其立場與吳德功《施案紀略》之同情民眾相近，但直接以悲憤強悍的詩句指責官府，更具備了高度的勇氣和強烈的批判性，讀之令人動容。若與本文前兩節所引述諸詩作，單純稱起事民眾為寇，或歸咎於民眾之無知相互比較，洪棄生此詩無疑更合於人情、更貼近民心。

至於洪棄生在〈鐵車路〉、〈機器局〉、〈西洋燈〉等相關詩作中，也對劉氏新政多所批評，其中，雖然也有部分理由是出自為民眾利益考量，但更根本的原因則是對西方現代文明的排斥，試以〈鐵車路〉一首為例：

聲轟轟，如霆雷。火炫炫，如流電。雙輪日馭速催行，回頭千里忽不見。抵掌欲笑夸父遲，輪臺一日周圍遍。西人逞巧亦良危，顛躓往往艱一線。我道帶礪在河山，縋幽鑿險山河變。自古眾志方成城，不聞鐵車與敵戰。又況勞民復傷財，民窮財盡滋內患。台灣千里如金甌，渾沌鑿死山靈顛。有潦有流間其間，不能飛渡復中斷。借問鐵路何時成，請待天爐為熾炭。

全詩主旨，乃在反對興建鐵路。其反對理由包括：勞民傷財，山川地

理形勢將被破壞，施工困難度大，河流阻擋無以飛渡，將迫使鐵路中斷等。並認為保家衛國之道在以團結為首要，眾志成城之精神力，能勝過鐵路火車之動力與便捷。以現代觀點來看，其反對理由與顧慮大抵皆不能成立，實毋待多言。雖然施工確實困難，但終究以當時技術一一加以克服，且興建鐵路之資金來源，是募集民間商股所得，亦非勞民傷財之舉。至於以為團結勝過科技文明，則反映出傳統文人之保守與迂闊，對引進西方文明之恐懼與無知。依據劉銘傳〈擬修建鐵路創辦商務摺〉所述⁵¹，劉氏認為興建鐵路的好處，主要是著眼於促進貿易、便利交通與運輸以帶動商業發展，另外還包括：有利於海防、建省、橋工（節省官方建橋支出），完成後更可添大宗收入充實海防等。其中藉鐵路建設帶動商業與交通發展，顯然是洪棄生未能理解、重視的，因而只從地理與防衛觀點加以反對，更何況「自古眾志方成城，不聞鐵車與敵戰」的反對理由亦無法成立。

劉銘傳時代，台灣鐵路只完成基隆至新竹一段，日治時期接續完成西部縱貫鐵路，約在1907年左右，從新竹至高雄九曲堂，已陸續在日人手中施工完成，並於1908年舉行基隆至高雄縱貫線鐵路的通車典禮。⁵²本文前述各節所論櫟社徵詩是在1912年舉行，當時台灣人想必都體驗到現代火車帶來的種種好處，因此也就理所當然更佩服劉銘傳當年的遠見了。

至於〈機器局〉一首，他批評劉銘傳奏請成立機器局的理由是：「損傷元氣民怨嗟，台灣腹削痛膚理」，這是出自其一貫關心民眾被官府剝削的人道精神，固然可欽，但詩中他又力言：「國家自強在無形，銷金鑠石通精誠。西洋有道不在器，惠政善謀無不興。國強不聞恃險馬，區區利器何足行。」同樣是「精神重於現代文明器物」的論調，未免過於偏執。若詳看劉銘傳〈奏報造成機器局軍械所並未成大機器廠摺〉一文⁵³，其實機器局是為了製造洋槍所需的子彈而成立，先前劉銘傳已委託張之洞代購製造槍彈機器一副，故需建造機器局廠以實際生產軍械彈藥，如此而已，並無剝削民眾之實。

此外，他在〈西洋燈〉詩中大嘆：「西洋技巧遍天下，中華物產失其

利。我嘆台灣尚洋燈，一端可以驗風氣。安得堯舜重光出，世間還淳返璞歸郅至。」與魏清德〈追懷劉壯肅〉詩中說：「照城電盞獨光輝，有懷壯肅無尋處」同樣是寫電燈，兩人對劉銘傳一貶一褒，恰成鮮明對比。

總結洪棄生對劉銘傳新政的批評，從正面來說，作者能站在庶民角度，批評新政執行時的實際缺失，揭露新政帶給民眾的痛苦和冤屈，頗富道德勇氣，在習慣附和官方觀點的傳統文人社群中，的確顯得彌足珍貴。從反面來說，他反對引進火車、機器、電燈等西方現代科技產物與文明成果，卻流露出他作為傳統文人的保守性格，無法貼近時代脈動，調整思想觀念。

陸、結語

綜合以上各節論述，筆者歸納本文結論如下。

一、櫟社於1912年藉慶祝成立十週年之機緣，以〈追懷劉壯肅〉一題向全台各界公開徵詩，題目是沿用1911年梁啟超來訪時的命題，徵得作品數量多達九十首，體裁包括五、七言古體詩，及近體七律、七絕、五律等，作者涵蓋台灣西部北、中、南各地詩人，內容十分豐富多元，頗能反映日治時期台灣傳統詩人對劉銘傳的看法。至於為何這些作品全部都對劉銘傳治台成績給予極高的推崇，筆者推測有三種原因：一是晚清衰敗與日本領台的巨大衝擊，二是日本人對劉銘傳的肯定，三是傳統文人的理想投射與私人感情因素。

二、〈追懷劉壯肅〉一題寫於1912年，乃是滿清滅亡，民國正式成立的關鍵年代，而台灣當時已由日本統治十七年之久，台灣與中國都面臨政治局勢的衝擊與巨變。時代性反映在本題作品中，呈顯出頗為複雜的面向，包括晚清與民初政局、台灣歷史與時事、詩人對當時日本統治者所持的態度等，都有直接間接的映現。筆者分別就「敘述語氣」與「書寫立場」，釐清其間的差異及箇中意蘊。

三、就「敘述語氣」來說，大致有三種趨向，分別是：以贊頌為主、以感慨為主、兼融兩者合一。這三種趨向，與寫作的心理動機有密切關聯。就「書寫立場」來說，也有三種差異，其一是站在漢人立場，以漢族意識為本，藉緬懷劉銘傳，寄託對日本領台的強烈抗拒；其二則恰恰相反，在推崇劉銘傳的同時，也高度肯定日本對台灣建設的貢獻，認為日本已完成劉銘傳遺志，顯示向日本傾斜的依附立場；第三種則是游移於兩者之間，

⁵¹ 本文見《劉壯肅公奏議》，頁268-273，台灣銀行出版「台灣文獻叢刊」本。

⁵² 參見《台灣鐵路百週年紀念》專刊，頁9-13，台灣鐵路管理局發行，1987年6月。

⁵³ 本文見《劉壯肅公奏議》，頁265-266，台灣銀行出版「台灣文獻叢刊」本。

反應被殖民者矛盾錯亂的族群認同情結。而台中櫟社與台北瀛社詩人，在這個議題表現出明顯的差異性：一般而言，櫟社漢族意識強烈，普遍較具抗日立場；瀛社主要成員則與日本官方關係密切，其作品傾向認同接納日本統治。

四、論這些作品所呈現的「劉銘傳的文學形象」，大致上可歸納為以下幾點，分別是：戰功彪炳、政績卓越、文采風流、壯志未酬、聲名不朽等，劉銘傳在這些作品中，是以幾近完美人格的典型被描述歌頌，反應詩人集體的理想投射心理與對舊時代的懷念。論其寫作的常見手法，大約有「簡單化」與「誇大化」兩端，前者從對劉銘傳「清賦」的議論，可看出詩人的單一頌揚觀點之缺陷；另一種「誇大化」，可具體觀察詩人如何以誇大的想像筆法，呈現劉銘傳的「完美崇高典範」。

五、在櫟社徵詩作品之外，筆者從丘逢甲、吳德功、洪棄生、賴和的詩作中，發現這些詩人對劉銘傳的評價有程度不一的保留。丘逢甲並未在詩中直接批評劉銘傳，但可推測對劉銘傳的評價未必高。吳德功、洪棄生、賴和對劉銘傳新政中因清丈不公引起的施九緞事件，都採取同情起事民眾的觀點，對官府頗有微詞。吳德功參加該次櫟社徵詩活動，卻刻意不寫〈追懷劉壯肅〉，可能是對劉不滿使然。洪棄生在晚清當時，對劉銘傳批評最為激烈，但其批評有正、反的雙重意涵，也反映出評價劉銘傳的複雜面向。

【誌謝】本稿之完成，要特別感謝施懿琳、黃美娥兩位教授在筆者構思過程中的切磋指點。

第五屆「中國近代文化的解構與重建」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鄭成功、劉銘傳】
2003年4月25~26日

明鄭時代澎湖之防務

鄭喜夫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委員

【提要】明鄭時代是臺灣歷史上一個關鍵性、決定性的階段，歷時不長，但可再細分若干時期。明鄭時代臺灣歷史圖像中尚屬空白或有欠清晰處，及值得探討的問題均不在少數。有關澎湖防務問題，即是其中之一。正文四節內容：

明鄭時代臺灣史之分期：可分為「開臺前期」、「西征時期」、「衰亡時期」三個時期，並依次細分為三、二、二個子時期即階段。

明鄭時代澎湖之側寫：扼要介紹澎湖的地理位置、面積、地質狀態與分布、地勢概況；繼則證明澎湖沒有與臺灣相同的「荷據時期」，延平亦無「光復澎湖」之偉績；次介紹明鄭時代澎湖三十六嶼居人情情形；最後討論澎湖安撫司設置的時間。

明鄭時代澎湖之防務措施：乃並其他與澎湖防務關涉較深者一並簡要列述。

最後為探析及結論：（一）明鄭當局對澎湖防務的重視程度偏低，（二）明鄭時代澎湖防務深受兩岸關係及敵情變化的制約，（三）明鄭時代澎湖防務的主觀條件深受西征之役挫敗的影響，（四）疏防八罩水道以南諸小嶼的錯誤，（五）情報戰與反情報戰有得有失。附帶一談澎湖之役劉國軒何以三次不允宣毅左鎮邱輝依兵法進擊敵師的請求。